

王火：以笔为枪 初心如炬

文 / 程少华 昱 青



王火

王火，男，原名王洪溥，江苏如东人，1924年7月生于上海。中共党员，中国作协名誉委员。194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四川文艺出版社原书记、总编辑，四川人民出版社原副总编、编审，四川省第五、六届政协委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1980年重写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历时12年完成，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1987年春离休。1995年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2023年获川观文学奖终身成就奖。

王火父亲王开疆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院，后任律师、大学校长，因拒绝与汪伪政权合作被害。1942年，王火穿越封锁至四川江津，考入国立九中后进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其间，发表了短篇小说《天下樱花一样红》。1946年，王火以特派记者身份率先报道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及战犯审判，发表《被污辱与被损害的》等通讯。1948年，王火出版专著《新闻事业关系论》，放弃赴美深造机会留校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火参与筹建上海总工会、劳动出版社，创办《工人》半月刊。1953年，王火调任《中国工人》杂志编委期间创作《赤胆忠心》等作品。1980年，王火重写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历时12年完成，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1987年，王火因救孩童致左眼失明仍坚持写作。2025年，王火出席《火铸文心：王火传》新书发布会。

编者按：王火，本名王洪溥，1924年7月生，中共党员。194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历任四川文艺出版社书记、总编辑，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编审，四川省第五、六届政协委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1987年春离休。著有长篇小说《战争和人》《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外国八路》《霹雳三年》《雪祭》，中篇小说集《边陲军魂》《隐私权》《心上的海潮》，散文集《西窗烛》《人世绘》等。中国作家协会在致“王火文学创作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的贺信中说：“王老用行动告诉我们，对革命的赤诚信念，对写作的一腔眷爱，对人间真善美的守护与践行便是生命之‘火’。这熊熊炬火照彻历史长河中的英雄与传奇，依然温暖而有力地照耀着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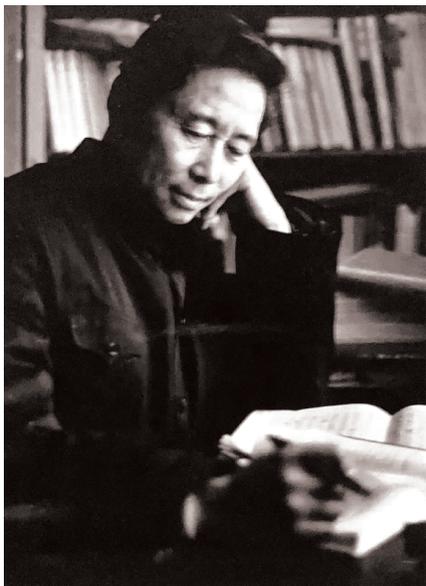
从“孤岛”到大后方

1924年，王火出生在上海。

他的父亲王开疆是江苏如东人，16岁离家远行。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法政科毕业回国后，致力于政法教育事业，当过律师，还与友人共同恢复具有革命传统的中国公学，在中国公学、南方大学任商科系主任、法律系主任，兼任上海大学、暨南大学等学校的教授，参与创办上海法政大学，是一个很有民族气节和社会影响的人，后遭汪伪政权迫害致死。

王火的母亲李荪是上海人，年少时反抗外婆给她裹脚，后抵制封建婚姻，到苏州桑蚕学校读书，毕业后成了一名小学教师。

王火6岁时父母离婚，之后跟着父亲和继母吴德芳一起生活。“她对我很



1980年，刚写完《战争与人》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的王火。受访者供图



王火、凌起凤夫妇与女儿在一起

好，常给我讲一些世界名著，比如《爱的教育》之类的，对我的文学之路影响很大。”王火回忆继母时说。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火随父亲辗转迁移，从南京到芜湖，再到汉口、广州，再到香港居住近一年，又回到上海。在被称为“孤岛”的上海，王火进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初中部读书，与同学一起，满腔热血地在大街小巷用粉笔书写抗日标语，散发抗日传单。渐渐地，他萌生不能当亡国奴的想法，决定离开上海，到大后方抗日，去重庆继续求学。

1942年7月初，王火从上海到南京、芜湖，再坐火车到合肥。在沦陷区通过封锁线很艰难，王火在合肥待了20多天，终于在绕路120多里后到达上排河，逃出沦陷区，踏上抗日的土地。一路上主要靠步行，王火的脚上常磨出水泡，他使用“媒子”（用黄表纸卷成的捆，吸水烟的人用此点烟）熏干水泡后拿针挑破。遇到干旱天气，他将石头下潮湿的泥抹进嘴里。经历九死一生的艰难困苦，9月下旬，王火终于到达四川江津

（现重庆市江津区），投奔堂兄王洪江。

采访南京大屠杀战犯审判过程

在王火家中，放着一块他十分看重的铭牌，那是中国作协颁给参加过抗日战争老作家的，上面刻着“以笔为枪 投身抗战”8个大字。“我当年的职业理想并不是当一名作家，而是要像萧乾、‘大兵记者’恩尼·派尔那样，成为一名战地记者，为公平正义鼓与呼。”王火曾这样说。

1944年，高中毕业的王火想考大学新闻系。当时全国只有三所学校有新闻系，其中复旦大学最有名。王火从报考的596名考生中脱颖而出，以第7名的成绩金榜题名。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著名的战地记者、翻译家萧乾是王火的老师，王火获益良多。

1946年，读大三的王火作为特派记者，为重庆《时事新报》、上海《现实》杂志等报刊撰稿。此后的三年中，他用王公亮、虚舟、马力等笔名，发表多篇散文、小说、评论。

王火是第一批报道南京大屠杀战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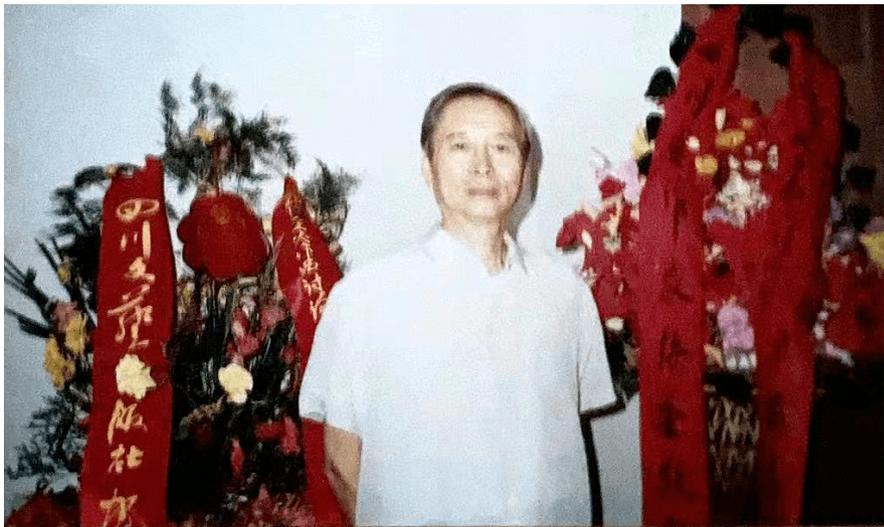
审判过程的新闻记者之一。1946年2月，学校交给王火一份工作——以上海、南京特派员的名义，前往南京采访审判日本战犯过程。怀着对侵略者的仇恨及远大的新闻理想，王火奔赴南京。他对南京大屠杀的过程进行调查，采访幸存者，目睹了遇难者丛葬地的发掘过程。

王火有意识地寻找一些女性受害者，包括曾在审判谷寿夫的法庭做证的李秀英。“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站出来。李秀英能主动出庭做证，引起了我的注意。庭后，我便主动约访了李秀英。”

随后，王火在上海的《大公报》和重庆的《时事新报》上，以“王公亮”为笔名，发表《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受审详记》《被污辱与被损害的——记南京大屠杀时的三位死里逃生者》等长篇通讯，引起强烈的社会轰动。

“苦辣酸甜一部书”

“王火”这个笔名使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取自高尔基的名言“用火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



1998年,王火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在家中接受四川省作协、文联赠送的花篮 田闻一 供图

被评为“史诗性书写”的《战争和人》获得茅盾文学奖,还多次再版,但这部作品的成书过程并不容易,可谓一波三折、九转功成,被王火称作“苦辣酸甜一部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火在上海总工会工作,虽日常工作繁忙,但王火不爱下棋、打扑克,觉得精力有余,决定写一部100万字以上的小说,反映抗战时期可歌可泣的壮举。

就这样,王火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撰写《战争和人》的前身——《一去不复返的时代》,三部分别为《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枫叶荻花秋瑟瑟》,以主人公童霜威、童家震父子在抗战过程中的行踪为线索,展现从西安事变到抗战胜利的恢宏历史。

1953年,王火调至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先在工人出版社任编辑组长兼通联组长,后在《中国工人》杂志社任主编助理兼编委。任务繁重的王火仍旧坚持创作,120万字的三部曲初稿完成。

1961年7月,王火被调到山东,担任临沂一中副校长。临行前,他将厚重的书稿送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几个月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将书稿及修改意见

寄给王火,称其“是百花园中,一朵独特鲜花”。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这部耗费王火二十年心血的小说突然成了“为国民党树碑立传的大毒草”,王火悲痛地将它付之一炬,烧为灰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向王火发出挂号信,邀请他出版长篇小说《一去不复返的时代》,王火去信说明实情。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于砚章鼓励王火重新将小说写出来。1980年,55岁的王火开始动笔重写总题被改为《战争和人》的三部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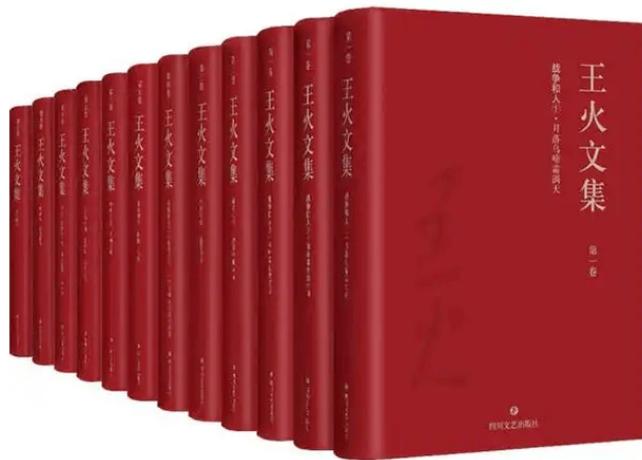
1983年,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在山东完成初稿。

1983年秋,王火由山东调到四川成都,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并创建四川文艺出版社,王火继续《战争和人》的创作。

世事无常,1985年5月的一个雨天,王火拿着书稿清样去出版部门,正在兴建的出版大厦工地上沟坎纵横,王火为救一个掉进深沟的小女孩,头部撞上钢管,晕了过去。他的颅内出血和脑震荡虽然治好,却落下后遗症:左眼完全失明,右眼视力有限。王火在楼梯上摔过三次跤,还将开水倒到手上,连正常生活都成了问题,不得不在1987年提前离休。

王火不愿功亏一篑,仅靠右眼继续写作。因连电脑光标位置在哪里也看不清,所有文字都由他手写而成。王火右手执笔,左手端着放大镜,罩在高度老花眼镜上,写作过程十分艰辛。

终于,三部曲分别于1987年、1989年和1992年出版。1993年7月,以《战争和人》为总名的套书出版,反响极大,将人民文学奖、国家图书奖、茅盾文学奖、四川省郭沫若文学奖等一一收入囊中。



《王火文集》是作家王火(本名王洪涛)创作的作品全集,由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共10卷12册600余万字,收录其1944至2012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散文、回忆录等作品。该文集由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支持出版,主要收录作者1976年后整理的作品,包含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战争和人》三部曲及《霹雳三年》《外国八路》等代表作

跨越台湾海峡的旷世真爱

在《战争和人》的扉页，印着王火与妻子凌起凤的合影。王火写道：“熟人都知道我有值得羡慕的‘大后方’。几十年来我和凌起凤在生活和创作上始终是最好的‘合作者’。”在王火看来，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应该有妻子的名字”。

凌起凤原名凌庶华，其父是辛亥革命元老凌铁庵。1942年，王火历经万难，从上海来到大后方，在江津国立九中插班上学。凌父与王父是旧交，王火去凌家拜访，聪明文静的凌起凤很快博得他的好感，后来两人为国立九中同学。王火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向凌起凤表露爱意，两人很快坠入爱河，于1948年订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凌起凤随家人去了台湾，王火与凌起凤在外界不看好的情况下一直鸿雁传书，从未间断往来。王火知道，海峡那边的凌起凤承受着巨大压力，写信希望她尽快回大陆与自己完婚。

“那时，为了爱情我觉得再大的牺牲我也可以付出，主要是不忍离开父亲，但父亲最爱我，他为我思考得十分周到，他总说：还是让我先到香港然后再回上海是最佳方案。”凌起凤在日记中写道。

1952年，凌起凤告别台湾的家人，先来到香港。这时，她却陷于进退两难中：如果回了大陆，台湾方面会如何追究她父亲的责任？自己回来是否会影响王火？心力交瘁的凌起凤一病不起。

这时，李荪站了出来，不顾年岁已大、身体欠佳，出高价冒险“偷渡”去香港。为顺利回到上海，李荪为凌起凤策划在香港自杀的假象，凌起凤才回到上海与王火重逢，从此开启相濡以沫60



马识途书赠王火 马万梅 摄

余年相依相伴的生活。

王火在《花城》1981年第1期发表电影文学剧本《明月天涯》，以凌起凤的故事为原型，生动再现当年她回大陆惊心动魄的过程。

淡水之交，潭深千尺

自1983年定居成都，王火在四川已工作生活了41年。“成都是迄今为止，我居住时间最长的城市，绝对称得上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交了很多本地朋友，感情很好，比如像马老、李致。虽然我们并不常见面，但是在一个城市，总是感觉很心安。”王火如是说。

到成都工作的王火与马识途、李致一见如故，“我们谈人生、文学，非常投契，大有相见恨晚的知音之感”。几位老友每到重大节日或者彼此生日总要相聚，彼此新书发布也会到场庆贺。

2017年8月4日，《王火文集》首发暨赠书仪式在成都举行，103岁的马识途、88岁的李致冒着酷暑，亲临发布会现场。三位好友见面握手、拥抱，真挚之情令人动容。马识途讲述他与王火的深厚友情，朗诵了一首写给王火夫妇的七律诗：“淡水之交数十春，潭深千尺

比汪伦。同舟共渡风雨夜，相见无言胜有声。”

2019年6月20日，《李致文存》新书首发仪式在四川大学举行。105岁的马识途、95岁的王火来到现场，畅聊李致其人其文。由于身体原因，那时的王火很少与外界接触，但仍坚持参加这个仪式。

2024年3月28日，马识途在成都仙逝。100岁的王火深情地献上悼词：

“敬挽马老识途：蜀山肃立，松林摇曳，哭赤胆忠心老革命。川江奔流，江潮号啕，挽世界罕见大作家。”落款是李致、王火。王火的女儿王凌说：“爸爸最后落款要加上李致的名字，而且要加在自己名字的前面。他们仨是很多年的好朋友，几十年来很多事情都是在一起，遇到谁过生日，其他两位一定会送上真诚的祝贺。此前他们身体状况都良好的时候，还会在一起雅聚，打平伙，在一起吃饭。”

多年来，王火做到“两个坚持”，一是不签名售书，二是不做报告。因年事已高，如今的他很少公开露面。王火很喜欢作家周克芹的名言并将它视为座右铭：“背对文坛，面向生活。”（本文选自晚霞杂志）

王火：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尊重历史

文 / 王 火 张 杰



王火家庭照

王火原名王洪溥，江苏如东人，1924年7月生于上海。194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43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外国八路》《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浓雾中的火光》《雪祭》《流萤传奇》《女人夜沙龙》《霹雳三年》和《战争和人》三部曲：《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枫叶荻花秋瑟瑟》，以及中短篇小说集《梦中人生》《流星》等。作品曾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炎黄杯人民文学奖、全国八五期间优秀长篇小说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为正义而呼的新闻名笔

张杰：您气质明净淡泊，但名字却是火。这个“火”，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王火：我原名王洪溥。王火是我给自己起的一个笔名。从大学时期发表文章开始，我用过很多笔名。新中国成立以后，要出书，我开始用“王火”这个笔名。因为高尔基讲过一句话，“用火

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我觉得这个“火”字简单又是红颜色的，又可以烧毁旧世界。

张杰：看履历得知，您的家世很不一般。

王火：我的父亲王开疆（1890—1940）是江苏如东人，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学习政法，毕业后赴北京考取法官。1916年回上海，任《民国日报》律师，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深造，1920年毕业后回上海，开设律师事务所，并担任《民国日报》律师，又在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南方大学、暨南大学等校开课讲授法律，与徐谦等人创办法政大学。我1924年出生于上海。小时候我们家住在上海小东门裕福里，邻居都是上海滩的名人，比如著名学者章太炎，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音乐家黎锦晖。黎锦晖还是我哥哥的干爹。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于右任做法官惩戒委员会主任，请我父亲去做秘书长，我父亲就到南京工作了。起先我父亲当的是国民政府法官惩戒委员

会秘书长。几年后，可能因为他工作成绩比较好，就当上了“国民政府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专任委员。这个职位属于特任官，专门惩戒人的，算是位高权重了。国民党的官员当时工资很高，每月800块钱，那时候鸡蛋只要一分钱一个。我父亲为人很正直，工作非常尽职尽责，有爱国情怀。

张杰：从您的气质也可以看出，应该是小时候受到非常好的家教熏陶。幼年的家庭教育是怎样的？

王火：我父母在我六岁的时候离异了。父母离异后，我和我的哥哥被判给父亲，妹妹被判给母亲。但是我哥哥不愿意跟着父亲，于是他就留在上海跟着母亲。后来哥哥大了，他才到南京来，我们俩才重聚。我因为缺少母爱，童年生活会感觉到很寂寞。我每天有很多时间，是与父亲的秘书在一起。或者在院子里晃荡，思念妈妈。后来父亲再婚，继母吴德芳对我很不錯，她是北师大教育系的毕业生。她常给我讲一些世界名著，比如《爱的教育》之类的，对我影响很大。父亲有父亲的书房，继母有继母的书房，我有我的书房。继母还在我的书房里专门摆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套“小学生文库”。好几百本，薄薄的小册子，天文、地理、小说、散文，什么都有。我哥哥则另外有一套“中学生文库”。我父亲也是个爱读书的人，他书房里一面墙是木箱装的二十四史，我没事时常跑到他的书房里去翻书。当时的我，还看不懂《三国演义》《西游记》，但书里的绣像画、插图，我很喜欢。总体来说，幼年时我受到的家庭教育是很好的。

张杰：您父亲对您教育的风格是怎

样的？

王火：父亲的教育方法很特别，不打不骂，但是要谈话，我最怕和他谈话。他不要我拿第一第二，只要我做个好学生，一个好人。万事都要讲一个“好”字，功课做得好一点，待人好一点，体育搞得好一点。虽然在我16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就这点对我来讲，影响很深。父亲请了一个家庭教师辅导我的学习，他有两个秘书，待我也很好。这说起来有些假公济私，他们陪我骑自行车，陪我溜冰。有一位叫徐国平，是个大学生，会日语，那时候已经很仇恨日本人了，我说你是汉奸啊，怎么还会日文。他说自己就是想多学一门国外的文字，所以我还跟着他学了一点，现在还能说上一两句打招呼的话。

张杰：您曾经写过文章回忆您少年时代在香港的往事，反响很好，大家说您写得非常真实，还原了当时香港的一些细节。那是怎样的情况？

王火：1937年，战争爆发，我上初中一年级。我从南京到安徽芜湖，从芜湖到南陵，从南陵到安庆，从安庆到汉口，再从汉口到广州，从广州到香港，到香港我没有进学校，而是请了一个家庭教师教功课，在香港住了一年又回到了上海。再后来的1940年，我父亲为了逃离汪伪政府的绑架，我们又到了香港。我记得，每天一早，我就按照父亲的要求，到六国饭店门口和附近的报摊上去买《大公报》《南华日报》及其他一些报纸，看战况和国际新闻及评论。

张杰：您父亲去世那一年您才16岁，这之后您的生活是怎样的？

王火：我父亲去世后，我在香港待了没多久，就由香港回到上海了，在东吴附中读书。再后来我投奔了我母亲。1942年，我18岁，和一个叫作夏家连的人一起从上海前往陕西，我们从上海到南京，从南京到芜湖，从芜湖坐火车到



王火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在布拉格参加活动

合肥。爬山越岭绕道，拉纤乘船渡水，通车的地方就乘车，不通车的地方就走路，一听到枪声停下来，赶紧找个本地人带路，还在一个农民家里住了一个多月，最终突破日本人的封锁线，在河南洛阳附近的水寨我跟他分手。然后只身一人前往重庆江津。当时，我与家人失去联系，他们都不知道我是死是活。到重庆后，我先去找我哥哥，他当时在重庆兵工大学，然后又到江津找我一个堂兄王洪江，他是我父亲培养出来的，我就去投奔他。后来我就在国立九中继续读书，上高二和高三。

张杰：你少年时代的理想是什么？

王火：六七岁时，我经常看到很多兵穿着军装，拿着刀列队在上海街头走过，唱着“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非常威武，心里非常羡慕，很想长大后做个军人，勇敢地像个英雄一般在沙场上打仗；后来由于看了《金银岛》《人猿泰山》《瑞士家庭鲁滨逊》等许多小说、故事和电影，就又想做一个航海家，日夜航行在惊涛骇浪的海上，想做一个探险家；我还想过学农业经济，因为中国是农业大国，我觉得我学这个对国家有点好处。当我在重庆江津国立九中读书的时候，学校里发生了一起中毒案。很多同学吃早餐时中毒被

送进医院，经化验是粥里放了砒霜。那天我睡懒觉没去吃早饭，于是参与了抢救同学的工作，目睹医生看到穷的学生不好好抢救的行为非常气愤，就写了一封批评稿投给《江津日报》，很快被刊出，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我于是觉得为人民做口舌还是好，可以为老百姓讲话。从那时起，我就埋下了学新闻当记者的心愿。

张杰：高中毕业后，您进入复旦大学念书，在大学受到哪些老师的影响比较大？

王火：当时有三所大学办新闻系：燕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思想最进步的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我就报考复旦大学新闻系。当时有近600人参加考试，只录取30人。我的成绩排在第7名。复旦大学新闻馆的对联是于右任撰写的：“复旦新闻馆，天下记者家。”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主任陈望道，是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引入中国的第一人，陈望道提倡学生要学会一个本事，就是无论怎样嘈杂的环境都能照样写作。教授中还有储安平、赵敏恒、王研石、萧乾等。萧乾先生教了我两年，他讲授英文新闻写作。他曾作为随军战地记者，亲历过诺曼底登陆等重大国际事件，他是真正的大记者。我



1942年2月10日，王火的稿件《南京大屠殺主犯谷壽夫受審詳記》发表在重庆《时事新报》上。受访者供图

斗，被刺了三十几刀，脸上被刀削的，她还怀着七个月的孕。她的父亲会武术她也会武术，她还夺日本人的刀。这么一位女性宁死也不被侮辱，你说南京人民不反抗，据我所采访的这些人，都说中国人绝对不是很孬种的。后来过了几十年，我在四川，听说李秀英仍健在，还委托我的侄儿，因为他在南京工作，去医院探望过她。在《月落乌啼霜满天》那本小说里，有一个叫作庄嫂的妇女，面对敌人宁死不屈，就是以她为原型创作的。

张杰：从事新闻工作的经历，对您后来的写作有怎样的影响？

王火：新闻记者的职业当然给我带来了非常深厚的生活积淀和锻炼提高文笔的机会，也让我对文学创作的兴趣更加浓厚。1944年，我开始在报纸副刊上发表小说，比如像《天下樱花一样红》《墓前》这些，都是很多素材在我头脑里，想要喷薄而出地爆发一样。所以我下决心要写一部史诗性的作品，才有了后来的《战争和人》。

历尽艰辛完成史诗性作品——《战争与人》

张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您先是进入上海总工会筹委会工作，后又调到北京的中国全总，为《中国工人》杂志工作，这段工作经历怎么样？

王火：办这个刊物对我是很大的锻炼。杂志每一期发稿都是我，全都是我签字以后发出去的。做这个工作，要求头脑要时刻保持清醒，不能糊涂，一糊涂就要出差错。我做编辑的工作的要求很高，如果在交上来的稿件中看到错字，就要退稿，但我并不是说看不起或者对人家很凶，而是很耐心，所以即使我再严格，他们也接受。1961年，我们这个刊物突然被要求“撤庙搬神”，我被调到山东临沂，说是两年后还可以回

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比如他说，新闻每每写出来时有生命，时间长了，生命就消失了，因此，写新闻时要注意加点“防腐剂”，即文学价值、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优秀的记者要努力将原本只具有短期生命力的新闻，变成价值持久的历史记录。这些都让我受益匪浅。储安平最特立独行，他教评论写作经常提醒大家一定要“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能平淡无奇。这些都让我受用终身。受萧乾先生影响，当时我还很想成为一名战地记者。

张杰：1949年，您获得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深造的全额奖学金，但你主动放弃了这次机会，你并没有去当一名战地记者。

王火：当时我觉得，世界从此进入和平时期，不会出现大的战争，成为战地记者的可能性比较小。虽然没有成为战地记者，但我对新闻十分关注，我十分推崇20世纪优秀的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的一句话：“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好，是你离战火不够近。”后来我也时常关注唐师曾、阎丘露薇等人的报道，我常常想，如果我在现场，我会如何最大程度地接近火线，做到最好。

张杰：虽然没能成为战地记者，

但您做新闻工作也非常出色。比如您当时率先采访并报道了因抗拒被侵犯而被日军刺了37刀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影响很大。

王火：当我还在复旦大学念大三，就开始写新闻报道。当时有读者写信给我，称我为‘教授’。我曾获同时担任三家报纸的记者：上海《现实》杂志记者、重庆《时事新报》和台湾省报《新生报》的上海、南京特派员。《匮乏之城——上海近况巡礼》《苦难中的江南造船厂》《我所看到的陇海线——换车误点旅客饱受辛苦，沿路碉堡使人触目惊心》等通讯、特写也非常针砭时弊。1946年，我奉命前往南京采访日本战犯谷寿夫的审判现场。那天，有不少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出庭作证。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满脸刀伤的少妇，用围巾半遮着自己的脸，在丈夫的陪同下走进法庭，对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行作证，她就是李秀英。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站出来。李秀英能主动出庭作证，引起了我的注意。庭后，我主动约访李秀英。她是个了不起的女英雄，当时我是第一个采访她、报道她的。我采访她的时候她就像《夜半歌声》里的那个脸。日本人要侮辱她，她同日本人搏



《战争和人》是作家王火创作的长篇小说三部曲，1987年至1992年分《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枫叶荻花秋瑟瑟》三卷出版，1993年首次集结，202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

北京。当时到北京已经快十年了。

张杰：在山东临沂的工作生活怎么样？

王火：刚到临沂，我发现那里不错。后来安排我到临沂的省重点中学临沂一中当校长。这所学校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学校是按照苏联模式设计的、建造的，很漂亮。学生很多，当时学校正在进行改教，但是改教情况很糟糕。孩子们该学的都改了，学生根本学不到什么东西。我到任之后，开始学习教育学，后来又看了一些苏联的教育课本，我是边学边干，工作很有效果。我觉得自己一辈子在那里搞教育，也挺不错的。我当时真的是愿意扎根在那里。当时是准备做一个教育家了，也参加了很多当地的教育活动。但“文革”爆发后，由于家庭以及写作的原因，我受到很大的冲击，让我非常心灰意冷，甚至想到自杀。爱人劝我要冷静地想一想，我们现在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我们走了，孩子怎么办？我想了很久，坐到凌晨，跟她说我不死了，再苦我也要支撑下去。



2022年,著名作家王火荣升“百岁翁”并从事文学创作80周年纪念

张杰：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你发表和出版的文学作品有三十余部、七百余万字，其代表作——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被誉为是反映抗战的雄伟史诗，先后获郭沫若文学奖、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炎黄杯”人民文学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榜首，被选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及《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评论家对于这部作品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战争和人》有助于青年一代和不熟悉当时“大后方”情景的人们更深刻地理解抗日战争的历史。但听说这部小说历时数十载，历经千难万阻才终得以成书。背后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王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就构思着，要将自己此前所经历的、观察到的写成一部作品。当时名字是《一去不复返的时代》（《战争和人》的前身），用三句古诗作书名，即《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枫叶荻花秋瑟瑟》，时间的跨度由西安事变写到抗日战争胜利内战爆发。从1950年到1953年，我在上海利用业余时间创作，进展较慢，但是雄心勃勃。1953年春天，我由上海总工会调至中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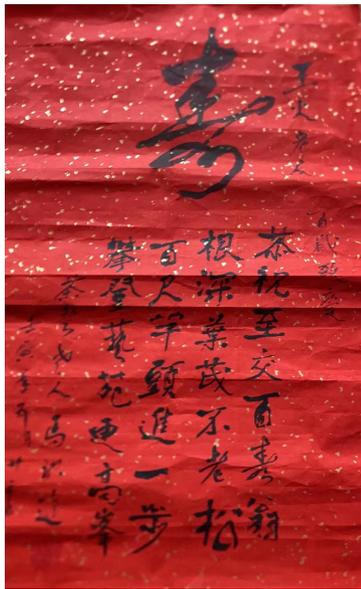
全国总工会，任《中国工人》杂志的主编助理兼编委。三年困难时期，经常饿着肚子奋笔疾书，总算突击完成了120万字的初稿。《中国工人》停刊后，我被派去山东沂蒙山区支农。“文革”时，这部书稿被说成“文艺黑线的产物”，稿子被拿去展览，我被批斗了无数次。我心灰意冷：都不要文化了，我还写什么呢！就在门口把这部凝聚了自己十几年心血的书稿烧掉了。

张杰：后来是怎么又开始重写的？

王火：“文革”过去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于砚章来信，询问这部稿件的下落，得知原稿已经被烧掉后，就鼓励我重新写出来。我早就熟悉明清之际史学家谈迁的故事。谈迁花了二十多年完成的《国榷》被小偷窃去，在55岁时重写《国榷》。受谈迁精神启发，我决定重写我那部被烧掉的小说。由于写过一遍，材料和素材都在脑子里，所以进展比较快。我是1982至1983年把第一部写完的。1983年秋，复旦大学的一位同学邀请我去四川人民出版社任职。我带着已完成的第一部手稿前往成都。我正投入写作时，我的左眼因为一次事故受伤失明了，但要把过去浪费了的光



王火百岁生日之际，马识途（右）和王火合影。
马万梅 摄



王火百岁生日之际，马识途为王火写寿祝贺。恭祝至交百寿翁，根深叶茂不老松。百尺竿头进一步，攀登艺苑更高峰

阴夺回来的心愿激励着我，我还是全力以赴，克服艰难，用一只右眼完成了第二部《山在虚无缥缈间》和第三部《枫叶荻花秋瑟瑟》的创作。

张杰：您左眼失明的事是因为救一个掉在沟里的女孩，听说是头撞到钢管上，导致脑震荡、颅内出血。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王火：1983年我到四川工作以后，担任了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有一天，经过工地下大雨，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掉到深沟里了。挖的地基不是很深，下了雨，里面还有水，当然淹不死孩子，孩子哭啊。当时下着雨，边上还有个年轻的工人，他不干，走了。我那年已经六十岁出头了，身体还很好，我当时两手撑着烂泥的两边就下去了，下去以后我就把她抱住，就把她托上去，我把她托上去以后她走了，我上不来了，为什么上不来了呢？下面有水不要紧，没有踩脚的地方我怎么上来呢？于是我就拿我的皮鞋踢这个泥啊，踢了半天，把它挖了个洞可以把脚垫进去，然后我就一跳，两手再一撑往上跳，可是

我没想到上面有个钢管头啊，钢管的一个头上还有螺丝钉这种东西，我这个头就“砰”，因为我这一跳力量很大了，一下钢管头就打到这个地方了，这就开裂了嘛，这个地方不就打了个洞嘛，满脸都是瘀血，整个脸都变成红脸了，瘀了皮肤没有出来的血，这个地方都碎了，然后我就跌下去了。这个工地这块是空旷的，没有人，我还得靠我自己。我自己还用这个方法，第二次用的力量就不像第一次那样了，我就连滚带爬撑上去了。我到办公室，他们一看，说你怎么这个样子了。当时视网膜还没有脱落，但是颅内出血了，颅内出血了变成什么状态了，第一就不会说话，后来就是这样，回到家就这样睡到床上，没有记忆了，什么事都忘掉了。后来动手术时，医生把我的视网膜弄坏了。我同妻子说，自己可能会是一个废人了。妻子还安慰我说，还有盲文。那时，我还真学习了一段时间的盲文，还用盲文创作了一篇文章，讲的是上海著名眼科医生“东方一只眼”带的两个女徒弟的故事。最后我的另一只眼还是保住了。

张杰：左眼失明对您的生活和工作肯定造成很大的影响，能坚持写作，是很令人敬佩的。

王火：因为左眼受伤失明，1987年我就离休了。困难是这样，最初期一只眼的时候，在楼梯上跌了三跤。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两个眼睛它有个焦点，一个眼睛的话它看东西不那么准确，倒开水嘛容易倒手上，现在不会了，当时一倒开水，开水浇了手，夹菜把夹到碗外面去了，你不信的话可以一只眼试试就这种局面。那么写东西、看东西呢，容易累、容易疲劳，另外我年纪大了它就老花了，不但老花有点玻璃体混浊，有点轻度的白内障，在这种情况下，这只眼睛的情况就比较差了。我搞这部稿子后期啊，就戴上400度的老花镜再用放大镜。这只手拿笔，戴着个老花镜，另外一只手拿着个放大镜，然后用手压住纸，所以比较困难。左眼失明后右眼视力也下降了，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办法使用电脑，因为我根本看不清光标在哪儿。

张杰：《战争和人》这部小说大概的人物设定也和您的实际家庭状况很相像，带有一定程度的自传色彩。

王火：我经历了抗战，过敌人封锁线，轰炸、炮火袭击、灾荒……都有经历，生活积累太丰富了，我所写到的地方，都是我去过的，我书中写到的人物凡用真名真姓的，都必定是我见过的或认识的。没见过的人我不写，没到过的地方我也不写。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尊重历史。我在沦陷区待过，在大后方待过，从1944年就同地下党有联系，对沦陷区、正面战场和解放区战场都比较了解，书中的人物都是我接触过的。我写了一百多个人物，各有各的样子，是有生活的，不是胡编乱造。但小说毕竟不同于报告文学，艺术渲染和加工是必要的。不过，小说中确有很多我自己的影子。或者说，如果我没有那些真实的经

历，是肯定写不出这部作品的。

张杰：您自己怎么看待《战争和人》这部作品？觉得它能代表您的文学创作吗？

王火：《战争和人》里包含了我最关注的事物和价值，也体现我的文学风格，是我花费时间和精力最多的一部，它再不能代表也就没有能的了。

张杰：《战争和人》一共三部，《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和《枫叶荻花秋瑟瑟》，一直从西安事变写到解放战争，有没有想过继续写第四部？

王火：三部曲出版后，我觉得这部作品还是写长了，本来我的第四部已经构思好了，但当时不太想写了。最后我还是写了，名字最初叫《春风又绿江南岸》，后来改名叫《霹雳三年》。作品中人物变了，写法也变了，但与三部曲中的人物，还会有一些关联。

张杰：除了长篇小说，您还写过一些短篇小说、剧本，都是跟战争有关的，是因为战争时代的事情给您的印象最深吗？

王火：对。战争时代的故事在我脑子里还有很多。不客气地说，我的短篇小说写得不错，但是短篇小说的影响不可能太大。有一年，华东戏剧汇演要我写一个剧本出来。我为此去一个村庄调研。那个村里家家都养狗，我不敢动，只好大叫。村里人闻声出来，把我带去找支部书记。支部书记就把我安排在一个招待所。他拉住我跟我讲：“待会儿要是有一个老太太过来问她儿子的事，你要说你儿子好好的。要是讲不好，她会伤心的。”原来这个老太太当年把儿子送去参军，儿子牺牲了，一去不复返，从那以后她就傻了，一天到晚坐在一棵树下纳鞋底，还想着要支援前线，纳好了就交到支部来。我就在招待所里待着，那位老太太真的来了，进来以后



王火与妻子凌起凤

她先对我笑，之后又问：我家孩子还好吧？我说他好他好。她就很高兴，又问：他现在还在打啊？我说他有时打有时不打，我就说些谎骗她。一会儿支部书记来了，说不早了，便要扶这位老太太去睡觉。我就跟着他俩走，我就发现老太太住在支部书记这院子里，上头的一间房子就是她的。支部书记陪着上去后，把破旧蚊帐里的蚊子全部扇出去，就像亲儿子伺候妈妈那样。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深，我就根据这个真实的故事，写了一个短篇小说。

张杰：除了《战争与人》三部曲，您创作的反响较大的还有长篇小说《英雄为国》《霹雳三年》《外国八路》，回忆录《长相依》《过客蓦然回首》等，这些作品，真实地记录了在巨大历史变动中作家的命运沉浮和心灵轨迹，留下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满腔热忱和对历史曲折的严峻审视。2017年8月，10卷12册680万字的《王火文集》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回顾过往，还有没有想写却没写出来的作品？

王火：还是有。有一个历史人物，叫白朗。这个人贾平凹写过，我也想写。讲孙中山和白朗的故事。孙中山送给白朗一幅羊皮的中国地图，很有诚意。因为白朗不知道地理的重要性，在

两省中间的地方，是十分重要的。我当时写了一篇未完稿“白朗”，但是由于外部原因而搁笔，后来能写的时候年纪又大了，我就不想写了。如果我要写，还得往白朗活动的地方走一趟，应该到甘肃这一带去，我写这些东西，可以加工，但是不要虚构，首先要做足调查。如果不做足够的调查，我是不会只凭资料写小说的。曾经有个读者读了《战争和人》，问我怎么把缙云山、嘉陵江写得那么真实。这不奇怪，因为我曾经在北碚读书。

人生亦可慰爱情堪传奇

张杰：您和妻子凌起凤的爱情也是一段值得称颂的传奇经历，两人一起历经风雨，才最终得以有情人终成眷属。您俩是如何认识的？中间发生过什么故事呢？

王火：我18岁遇到凌起凤，28岁结婚，她去世时88岁。她是属于那个年代的大家闺秀，她父亲是辛亥革命元老、著名爱国人士凌铁庵。1942年，我们在抗战初期的大后方四川江津相识、相爱。解放前夕，凌起凤随家人去了台湾，我们分别4年，一直靠书信往来。1952年，凌起凤为了与我团聚，作别台湾的家人，先在香港制造了自杀假象，改名



王火与妻子凌起凤。凌起凤老师是国民党元老凌铁庵的最宠爱的转香港
小女儿。她与王火在学生时代便认识，后来慢慢相知、相爱。

字后回到上海，与我结婚。那件事不光风险极大，而且她当时在台湾拥有很好的生活，她都毅然放弃。实际她离开以后，对她父亲很不利的。此后几十年，她都不能与家人联系。

张杰：在您眼中，妻子是一个怎样的人？

王火：她小时候生活是很富裕的，家庭地位是很高的。她有学问有教养，既可执教，也可为文，然而她为了全身心地协助我，放弃了很多，她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是我的“大后方”。而且，我写一部作品，她是我的第一个读者，给我提了很好的建议。可以说，她为我付出很大。拥有完美的爱情和婚姻，是我今生最大的收获。如果没有这个保障，我这一生，估计都走不到现在。

张杰：您和妻子既是爱人亦是知己，几十年恩爱如初，风雨同舟，令人羡慕。有没有什么夫妻相处之道的秘诀可以与现在的年轻人分享的？

王火：我和她相伴多年，几乎没有吵过架，也没有什么秘诀，就是两人很要好，我很爱她，她也很爱我，就这样，互相也可以谈心里话。也几乎没有意见不同的时候。没有夸张，我们还真的没有红过一次脸。也许是因为经过大风大浪，我们才走到一起，非常不容易。生活琐事带

来的小争论，都完全不会放在心上。她住院，我也陪住，基本3年都在医院里生活，很少回家，所以书桌什么的，都几乎没怎么动过。而且，我闭门谢客，推掉了所有的邀请，没有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全身心地陪她走完最后一程。爱人去世已8年，我至今仍然非常思念她，我还想早点走，好与她相见。

张杰：您在上海出生，又在南京、重庆、北京、山东临沂工作生活过。1983年来到四川，在四川待了35年。现在，在这些城市中，您觉得最有感情的、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座？

王火：坦白说，印象最深的还是上海和南京，毕竟我在上海出生，在南京有珍贵的童年回忆。但四川成都是迄今为止，我居住时间最长的城市，称得上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交了很多本地朋友，感情很好。四川人待人热情，性格活泼。这个地方很养人，藏龙卧虎。我爱人去世后，在上海的几个妹妹怕我孤单，多次邀请，要我回上海居住，但是我都拒绝了。一方面，我在成都已经住了近30年，感觉很舒服，这里有我的朋友们，比如像马老、李致。虽然我们并不常见面，但是在一个城市，总是感觉很心安。而且，因为她（指了指屋里摆放的爱人照片）还在这里，我要在这里

陪陪她。

张杰：您刚才说跟马识途和李致都是朋友，可以谈谈您之间的感情吗？

王火：我跟马识途，还有李致，我们感情都很好。有一些什么重大节日，我们经常都要聚一聚。我刚到成都的那一年认识的马老，我们谈人生、文学，非常投契，大有相见恨晚的知音之感。我比马老小十岁，我与他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有时半年都见不到一次，但是一见，谈起往事就非常亲。马老对我特别好。他可能觉得我这个人人品好，我确实对他也很真诚。他写过一首诗送给我：“淡水之交数十春，潭深千尺比汪伦。同舟共度风雷夜，相见无言胜无声。”我们并不经常见面，我也不怎么打电话给他，怕打扰到他。但是，虽然是“淡水之交”，马老却认为我们的友情深厚如李白和汪伦。

张杰：在认识马老之前，您有读过马老的作品吗？

王火：当然读过。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我就在杂志上读到过马老的作品，《找红军》《老三姐》，我一看，这是一个老同志写的，搞地下革命工作。一看作者名字叫马识途。名字好记，就记住了。马老现在人届高龄，完全可以弃笔休养了，但马老还在奋笔疾

书。据我自己查阅相关资料发现，能在104岁这么年纪还保持如此旺盛创作力的作家，马老是世界之最。我认为，这是他出于对文学的一腔眷爱，别无所图；这是对于祖国、人民的两肩责任，不愿冷漠。我有个提议啊，我觉得应将马老的长篇代表作《清江壮歌》翻译成不同语种，推到世界上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部优秀的作品。马识途和他的作品不仅是四川的、中国的，更是世界的宝贵财富。若不是我年纪大了，我就亲自来做翻译这个事情。

张杰：你从事出版工作多年，对出书有感情。现在还关注新书吗？对现在市场上的出版物，您有怎样的印象、评价？

王火：从前我也去淘一淘旧书，用很贵的价钱买过两本三希堂的法帖，可是生病之后，对身体情况小心翼翼，旧书上细菌太多，所以现在也不怎么去了。我还经常到高升桥的购书中心去看书。早上去，中午就在旁边的肯德基坐一坐。看书没有什么特定的种类，我愿意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常常翻看新书，摆在最显眼位置的畅销书我也看，有时看到喜欢的就买回家。譬如美国作家之父华盛顿·欧文的《瑞普·凡·温克尔》。这本书我在初中的时候看过，但是忘掉了它具体讲的是什么，所以再次看到这本书我立马就买了，重看一遍。看了，我发现这书和我小时候看的不一样。这本书讲一个叫瑞凡·温克尔的男人为了躲避唠叨凶悍的妻子，独自到附近的山上打猎。他遇到当年发现这条河的船长及其伙伴，在喝了他们的酒后，就睡了一觉。醒后下山回家，才发现时间已过了整整20年，人世沧桑，一切都十分陌生。有点南柯一梦的意思，但也不尽相同。

张杰：现在很多人习惯在电子屏幕上阅读、写作，您有怎样的感受？

王火：我落后了，我早就承认我落



王火与妻子凌起凤在华山

后了。科技进步是挡不住的，所以我觉得马老比我强，他用电脑打字，马老师是中国作家里最早开始用电脑写作的一批，我不行。我这边的眼睛由于做手术的缘故，一点视力都没有，我写东西得戴老花镜、放大镜，写起来很吃力。

张杰：您最喜欢哪些小说和作家？对您影响比较大的文学作品是哪些？

王火：我很喜欢长篇小说，雨果就是一位我喜欢的作家。他《悲惨世界》写得很特别，如果交给其他的编辑，这本书中间可能有6万字都不会被发表——滑铁卢之战。你看，这么长的篇幅，游离于主线故事之外，但写得那么好。这6万字是军事文学的标杆。我在写《战争和人》时，也学了他一下，但是学得不好。我用一整章来写南京大屠杀，但这按照当时的编辑意见，都是不应该写的。苏联的文学我也很喜欢，像托尔斯泰、果戈理，还有《静静的顿河》我也很喜欢，我喜欢肖洛霍夫塑造的女主角阿克西妮娅。《静静的顿河》后来被拍成电影，我看了两遍。还记得当时选角时，肖洛霍夫到制片厂去说，想看一看演员。制片人就陪着他去看，先看阿克西妮娅，看到那位女演员之后，肖洛霍夫就觉得可以了，我写的阿克西妮娅就是她。

张杰：除了读书，您还有哪些兴趣爱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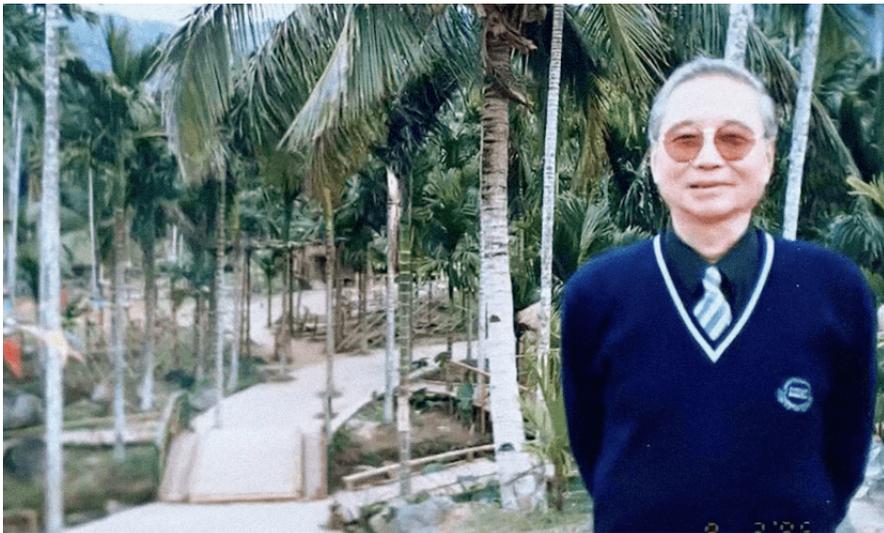
王火：我很喜欢看电影。我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待过三年，担任过审片的工作。我现在年纪大了，也看不了。我最喜欢文学片，文学名著改编的片子，滑稽片我也看，像查理·卓别林的片子。中国古典的文学我也很喜欢，我不像流沙河，钻研庄子和易经，我会背《古文观止》。总的来说，我的兴趣很广泛。

张杰：您一生充满了动荡，经历了混乱的时代，也遭受了很多苦痛折磨。如今您是如何看待过去的这些经历？有没有什么人生的智慧可以与我们读者分享的？

王火：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在大时代的背景下，我的一生确实充满变动，尝遍各种滋味。时代潮流与个人际遇共同推动的丰富经历，是我一笔宝贵的财富，可以让我更加深刻地感受社会、思考生活。岁月像流水，在流动的过程中，会遇到阻力，但是流水不会停止，它会另外找一条道路，继续前行。而且，遇到阻力的水流，往往更能迸溅出美丽的水花，具有平常所没有的动人之处。（本文选自《青年作家》2018年第11期，有改动）

战争和人 时光与火 ——走近著名作家王火

文 / 张 杰



王火应邀在海南岛参加笔会

人对时间是敏感的，担心时光匆匆，容颜易老；但人对时间又是势利的，迟钝的。对一个小孩子，你会想到他即将到来的美好时光；但对于一个老人，人们总不太真的记得，或者不太真的相信，他也曾经是对世界好奇的儿童，是风华正茂的少年。翻看作家王火的童年回忆录《金陵童话》，令人感慨。1924年，他出生在上海，跟随在国民政府任职的父亲在南京生活。由于父母离异，幼年的王火失去了母亲的关爱，陷入情感的孤独之中。1937年，王火上初中一年级时，抗日战争爆发。日寇轰炸南京，他随家人躲避战火辗转安徽、湖北，最终到香港。1942年，怀着满腔抗日热情，18岁的王火冲破封锁，从上海只身前往西南求学。一路先坐火车到南京、合肥，之后因战火阻隔，翻山越岭绕道，拉纤乘船渡水，经河南、陕西到达重庆江津。王火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就读期间就开始做记者工作，20世

纪50年代，王火离开上海，前往北京、山东工作。20世纪80年代，又调往四川成都从事出版工作……时光一旦过去，就永远地过去了；但文字作品，却可以像记忆的琥珀，晶莹剔透，折射出传奇而丰富的过往人生。

虽然已是93岁高龄，王火的皮肤依然白净均匀，身板挺拔，再加上气质温和，处事低调，如果不深入了解，一般人不会知道，这位年届九旬仍风度翩翩的老人，平生充满传奇色彩。1997年因《战争和人》获中国文坛最高奖茅盾文学奖，让王火的作家身份，格外凸显。但王火自己却说，严格算来，他并不是一个职业作家，“我当过记者、中学校长、出版社编辑，写小说是我工作之余的事”。

师从萧乾最想做战地记者，旁听审判记录南京大屠杀

王火说，他“当年的职业理想并不

是当一名作家，而是要像萧乾、‘大兵记者’恩尼·派尔那样，成为一名战地记者，为公平正义鼓与呼”。

在王火珍藏的剪报册中可以看到，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用“王火”“王洪溥”“王公亮”等多个名字，在报纸上发表过众多精彩的新闻特稿。“我用过很多笔名。王火也是自己起的，意思是‘熊熊烈火烧掉旧社会’。”

1944年，王火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在复旦读书期间，著名战地记者、翻译家萧乾是王火的老师。提到萧乾，王火的语气充满崇敬：“萧乾先生教了我两年，他讲授英文新闻写作。他曾作为随军战地记者，亲历过诺曼底登陆等重大国际事件。他是真正的大记者。”王火说，他从恩师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萧乾曾说，一般的新闻，生命力总是很短暂，优秀的记者，要努力将原本只具有短期生命力的新闻，变成价值持久的历史记录。这些都让王火受益匪浅。

1946年，还在读大三的王火作为特派记者，同时为重庆《时事新报》、上海《现实》杂志等报刊写稿。《匮乏之城——上海近况巡礼》《我所看到的陇海线——换车误点旅客饱受辛苦，沿路碉堡使人触目惊心》等通讯、特写不断见诸报端，还是大学生的他，渐渐向一名优秀、成熟的新闻记者靠近。“当时还有读者写信到复旦大学，称我为‘教授’，其实当时我大学还未毕业。”值得一提的是，王火还是第一批报道南京审判、南京大屠杀案的新闻记者之一，当时，他率先采访报道了因抗拒被侵犯，而被日军刺了37刀的南京大屠杀幸

存者李秀英。

1946年2月，王火奉命前往南京采访日本战犯谷寿夫的审判现场。那天，有不少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出庭做证。

“一位满脸刀伤的少妇，用围巾半遮着自己的脸，在丈夫的陪同下走进法庭，对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行作证，她就是李秀英。”王火说，“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站出来。李秀英能主动出庭做证，引起了我的注意。庭后，我主动约访李秀英。”随后，王火在上海的《大公报》和重庆的《时事新报》上，以笔名“王公亮”发表了长篇通讯《被污辱与被损害的——记南京大屠杀时的三位死里逃生者》，报道了李秀英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不幸遭遇，轰动一时。几十年后，王火在四川听说李秀英仍健在的消息后，还托自己在南京工作的侄儿去医院探望，引来南京媒体的热烈关注。正是因为有这些亲身经历，王火才写出了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战争和人》。这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创作的三部曲，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里塑造的在南京大屠杀惨案中，宁死不屈的妇女形象庄嫂，其原型就是李秀英。

1948年，王火从复旦大学毕业留校当助教。1949年，王火获得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深造的全额奖学金，但他主动放弃了这次机会，“当时我觉得，世界从此进入和平时期，不会出现大的战争，成为战地记者的可能性比较小。而且更重要的是，当时新中国即将成立，我想要留下来与大家一起见证、一起建设新中国，我不愿错过这么一个机会。”王火清晰地记得，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天，“我正在上海市总工会三楼的文教部办公室里与几个同志一起收听实况广播，当大家听到毛主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声音时，心中的激动难以用言语



王火文学创作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2022年不仅是他从事文学创作80周年的年头，7月17日，他还迎来了自己的百岁生日

表达。”

虽然没有成为国际战地记者，但王火这一生都对新闻事件十分关注。他很推崇20世纪优秀的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的一句话：“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好，是你离战火不够近。”看到唐师曾、闫丘露薇等人的战地新闻报道，王火会想象自己如果在现场，“会如何最大程度接近火线，做到最好”。

注入自己的影子写出《战争和人》

王火写新闻稿几乎都不打草稿，一气呵成。这种对文字的敏感度和把控力，他自认与幼年的家庭教育分不开。王火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父亲王开疆，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政法教育界名人，一位身居政坛高位的著名爱国人

士。王开疆毕业于东京早稻田大学政科，后回国定居上海，协同友人创办上海法政大学，任校董兼法律教授。之后，上海法科大学成立，章太炎为校长，王开疆为教务主任。1926年，北伐战争胜利后，王开疆被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提请任命为法官惩戒委员会秘书长，后又被任命为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专任委员。任职期间，王开疆守正不阿，以廉洁无私著称。

王火小时候住在上海小东门裕福里，“邻居都是上海滩的名人，比如著名学者章太炎，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音乐家黎锦晖。而且，黎锦晖还是我哥哥的干爹”。不幸的是，父母离异，6岁的王火随父亲从上海搬到南京生活，



“首届东方文豪终身成就奖”在成都举行了颁奖礼，两位著名老作家马识途、王火获得终身成就奖

失去母爱后的王火，“陷入情感上的贫穷，自此进入寂寞而又压抑的少年生活”。这段心路历程也被王火写进他的童年自传里，取名《失去了的黄金时代——金陵童话》。

据王火回忆，父亲有很多藏书，他从小就读到了《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的名著。他还特别提到自己的后母吴德芳：“她对我很好，常给我讲一些世界名著，比如《爱的教育》之类的，对我的文学之路影响很大。”

新闻记者的职业给王火带来深厚生活积淀和锻炼提高文笔的机会，让他对文学创作的兴趣更加浓厚。1944年，王火开始在报纸副刊上发表小说，比如《天下樱花一样红》《墓前》。很多素材在他头脑里喷薄而出般地爆发，他下决心要写一部史诗性的作品，于是开始了《战争和人》的创作。

《战争和人》以主人公童霜威、童家霆父子在抗战过程中的行踪为线索，表现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到1946年3月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人物行踪遍布大半个中国，具有突出的史诗结构和鲜明的史诗风格。记者问到这部作品是否具有自传性质时，王火想了想说：“小说不同于报告文学，艺术渲染和加工是必要的。不过，小说中确有很多我自己的

影子。或者说，如果我没有那些真实的经历，是肯定写不出这部作品的。”

然而这部作品的诞生并不容易，经历了非常波折的过程。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王火就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构思并写作《战争和人》。六七十年代时，他已经写好了120万字，但由于特殊的时代原因，十几年心血写就的书稿被付之一炬。到了20世纪80年代，王火重写《战争和人》。历经十年磨砺，这部共167万字的重磅长篇巨作终于完成。1993年，该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反响极大，被誉为反映抗战的雄伟史诗，获奖无数：郭沫若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国家图书奖、茅盾文学奖等重要奖项——收入囊中，还被选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及“中国新文学大系”。

罕为人知的是，《战争和人》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第三部，是王火在左眼失明的情况下，一笔一画地爬格子完成的。1987年，王火因为左眼受伤离休，他很平静地回忆那段日子：“上楼梯就摔好几次，倒开水的时候，一倒就倒在手上。”王火说，左眼失明后右眼视力也下降了，直到现在也没有办法使用电脑，“因为我根本看不清光标在哪儿”。

一段爱情佳话——妻子假装自杀跨越海峡与他相聚

王火所经历的传奇、美满的爱情是文坛一大佳话。王火凭借作品《战争和人》三部曲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战争和人》这本书的扉页，印着他与爱人凌起凤的合影。王火写道：“熟人都知道我有值得羡慕的‘大后方’。几十年来我和凌起凤在生活和创作上始终是最好的‘合作者’。”王火著述逾600万字，他说，“每一部作品都应该有妻子的名字”。

王火的爱人凌起凤原名凌庶华，1924年出生，其父是辛亥革命元老、著

名爱国人士凌铁庵。1942年，两人相识，坠入爱河。1948年，两人订婚。解放前夕，凌起凤随家人去了台湾，两人分别期间，一直靠书信往来。1952年，凌起凤为了与王火团聚，作别台湾的家人，先在香港制造了自杀假象，改名字后回到上海，与王火结婚。

回忆起这段往事，王火说：“那件事不光是风险极大，而且她当时在台湾有很好的生活，她都毅然放弃。此后几十年，她都不能与家人联系。”王火为此创作了一个电影剧本《明月天涯》，就是以妻子凌起凤的故事为原型。

王火说，凌起凤有学问有教养，既可执教，也可为文，“然而她为了全身心地协助我，放弃了很多，她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是我的‘大后方’。而且，我写一部作品，她是我第一个读者，给我提了很好的建议。可以说，她为我付出很大”。

2011年10月，华西都市报记者曾到王火家中采访，刚刚失去老伴的王火神情憔悴，沉浸在悲痛之中。当时，他的书房里到处都放满了还未开封的书籍包裹，摊开的诸多杂志，都不曾动过。提及当时的场景，王火说：“她住院，我也陪住，基本三年都在医院里生活，很少回家，所以书桌什么的，都几乎没怎么动过。而且，我闭门谢客，推掉了所有的邀请，没有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全身心地陪她走完最后一程。”

虽然凌起凤已经去世好几年，如今谈到去世的爱人，王火依然难抑激动，泪眼泛光，声音哽咽：“拥有完美的爱情和婚姻，是我今生最大的收获。如果没有这个保障，我这一生，估计都走不到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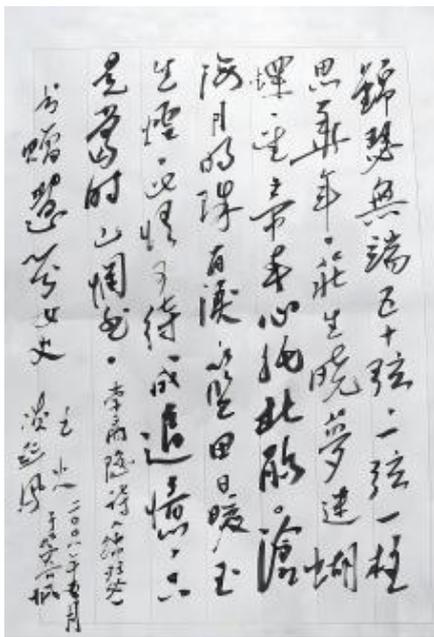
凌起凤走后，王火的情绪、意志一直很消沉，对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到了抑郁症的边缘。“她的去世，让我感觉好像自己生命的很大一部分也随她而

去了。我甚至想让时间变快，尽早跟她到另外一个世界团聚。”

王火自18岁与凌起凤相识相恋，两人相濡以沫近70年，“没有夸张，我们还真的没有红过一次脸。也许是因为经过大风大浪，我们才走到一起，非常不容易。生活琐事带来的小争论，都完全不会放在心上”。在采访中，王火还对华西都市报记者特别提到：“60年前的8月11日，是我们结婚的日子。明天(8月11日)是我和凌起凤结婚60周年纪念日。这个事情我连我女儿都没有告诉，因为我想自己放在心里，默默怀念她就好了。”凌起凤去世后，在上海的几个妹妹怕他孤单，多次邀请王火回上海，但他都拒绝了，“一方面，我在成都已经住了近30年，感觉很舒服，这里有我的朋友，比如像马老、李致。虽然我们并不常见面，但是在一个城市，总是感觉很心安。而且，因为她还在这里，我要在这里陪陪她。”

如今今年事已高，王火深居简出，很少公开露面。在川内，他与百岁文学家马识途，巴金的侄儿、作家李致交情深笃。每年一些重大节日，三人都会聚在一起。1983年王火到成都认识马识途，一见如故，“我们谈人生、文学，非常投契，大有相见恨晚的知音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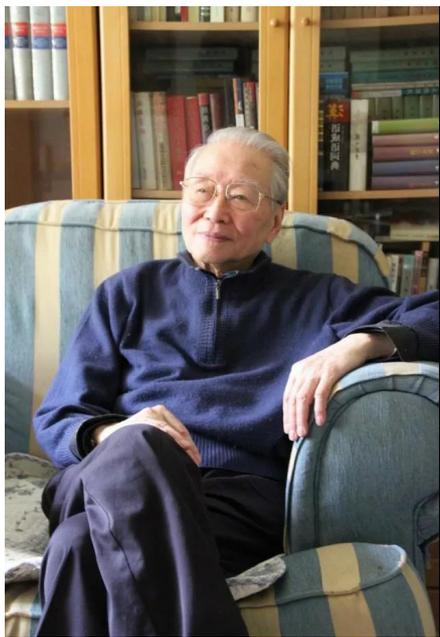
2005年，《马识途文集》出版，序文正是王火所写。2011年，凌起凤去世，马识途看到报纸上相关报道后，马上与王火通话，表示哀悼并致慰问之情，还专门写一篇名为《平凡的伟大——为凌起凤送行》的文章。文中，马识途老先生不吝笔墨，动情记述当时自己致电安慰王火的场景：“他以低沉得几乎听不清的悲戚之声说，他不愿意叫我这个老人分担哀痛，所以没有告诉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来安慰他，只照格式化的说法说‘节哀，节哀！’”文章中又提到，“我和老伴跟王火和凌起



王火手书诗笺

凤，相交并不太早，平常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并不时常来往，只是逢年过节，打个电话，发张贺卡。但是从开初的相交和其后不多的往来中，我们都有‘一见如故’的亲切之感，能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王火对马识途也很是敬佩：“他比我大10岁，对我是亦师亦友。他的作品，我常常找来读，他的小说被姜文改编成电影，我很为他高兴。在我看来，马老才是真正的革命家和真正的作家，我非常敬佩他。”

2017年8月4日上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10卷12册680万字《王火文集》，在成都举行首发仪式。93岁的著名作家王火出席活动现场，讲述了他创作获茅奖作品——《战争和人》与四川的关系，他当年从山东来到四川，从事出版、写作的心路历程。103岁的马识途、88岁的李致，都冒着酷暑，亲临发布会现场，庆祝《王火文集》出版。三位好友见面握手、拥抱，现场令人动情感动。在首发仪式上，马识途还朗诵了一首自己此前写给王火夫妇的七言诗，用李白和汪伦之间的感情来表达他和王火之间的情感：“淡水之交几十春，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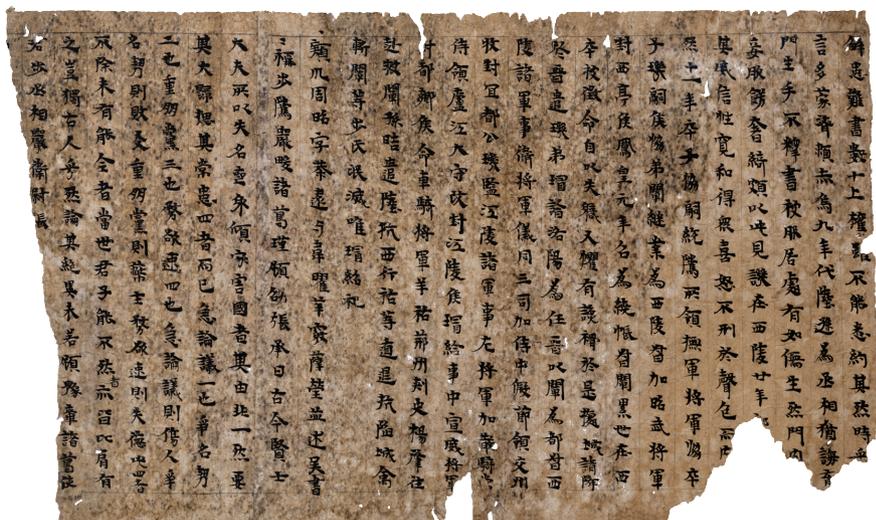


深千尺比汪伦。同舟共渡风雨夜，相见无言胜有声。”

王火的文学作品，多反映人物在巨大历史变动中的命运沉浮和心灵轨迹，留下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满腔热忱和对历史曲折的严峻审视。王火的作品中洋溢着英雄主义气息，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有助于青年一代更深刻地理解历史。除了文学作品，因时代、个性等因素塑造的王火的人生，经历传奇、品格纯正，堪称一部行走的卓越作品。回望过往，王火的大半生都在各地漂泊，他的感慨是：“事情都是有双面性的。一方面，在大时代的背景下，我的一生确实充满变动，尝遍各种滋味。大时代走向与个人际遇共同推动的丰富经历，也是我一笔宝贵的财富，可以让我深刻感受社会、思考生活。”他还意味深长地说：“岁月像流水，在流动的过程中，会遇到阻力，但是流水不会停止，它会另外找一条道路，继续前行。而且，遇到阻力的水流，往往会迸溅出美丽的水花，具有平常所没有的动人之致。”（本文选自华西都市报《传记文学》）

唐代敦煌写本书法艺术

文 / 赵声良



东晋《三国志·步骛传》敦煌研究院藏(敦研287)

敦煌写本与佛教写经事业

敦煌书法这一概念，源于敦煌藏经洞写本的发现。1900年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的一个洞窟（今编号第17窟）发现了数万卷文书，内容除了大量佛经外，还包括历史、语言文学、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文献，由此而产生了敦煌学（涵盖了古代历史、宗教、文学、语言学等领域），而大量的敦煌写本，对于中国书法史的研究也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敦煌文书，大都是手卷形式，用纸或绢从右至左抄写，然后粘接成长卷，最长的达十几米，所以也叫“敦煌卷子”或“敦煌写卷”。通常在尾部有木轴，使全卷可以卷起来存放，较考究的还加以裱背，但也有不少没有轴的。有少部分为蝴蝶装，即在两面书写，然后装订成册，此外还有一些散页。这些古代文书绝大部分是用毛笔抄写的，像这

样时代久远、数量巨大、风格多样的写本，可以说是中国书法史上尤为珍贵的资料，不仅可以大大拓宽我们认识中国古代书法的视野，而且对于今天书法艺术的继承和创新，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敦煌卷子的内容90%以上是佛经。抄写佛经对于信佛的人来说，是一种功德。因此，古代的善男信女们要抄写很多佛经，送到寺院里。那些文化水平很低，或者不善于书写的人，可以花钱请人代为抄写。于是，一种专门抄经的职业就兴起了，这就是“写经手”，也叫“写经生”。后来有的地方官府也雇用一些抄经的人，除了抄写佛经外，还抄写儒家的四书五经，并兼抄官府文书，称为“官经生”。对于佛教来说，写经流传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南北朝时期的写经已出现了抄写者、校阅者署名之例，说明一些地区的寺院抄经已成规

模。隋唐以后一些大寺院就设立抄经的组织，有严格的抄写审校制度。由于唐代的帝王崇信佛教，对于写经事业极为重视，于是就产生了宫廷写经的制度。宫廷写经不一定是在官中所写，可以委托寺院抄写，然后由政府设立监管的官员，严格管理抄经。经过宫廷监制的写经，往往是作为皇帝赐给各地寺院的经卷，具有范本的作用。因此，宫廷写经的要求极严，经卷的末尾，除了抄写人署名外，还有“装潢手”“详阅”“初校”“再校”“三校”以及监造者署名，而往往有官衔较高的人监制。如写于咸亨二年（671）的《妙法莲华经》（S.5319）注以及写于咸亨三年（672）的《妙法莲华经》（敦博055）等，除了写经、校经诸人之外，有“行大中大夫少府少监兼检校匠作少匠永兴县开国公虞昶 监”的题记，虞昶是当时大书法家虞世南之子，在朝廷中专门负责抄经之事。敦煌写经中有虞昶监制的写经还有不少，都是唐代宫廷写经的代表。

写经生是以抄写为职业，在书法艺术上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准，另外还必须满足人们的审美时尚。所以，大多数写经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审美精神，对于我们认识书法艺术发展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写经生受雇于人，不仅抄写佛经，道经、儒家经典以及文学作品也可抄写。另外，敦煌文书中也有一些儒家经典及文学作品系读书人所写，风格与



唐太宗《温泉铭》拓本 法国图书馆藏 (P.4508)

写经生的书法不一样。总体来说，敦煌写卷大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书手所写，书法不像书法名家那样富于创造性。但各时代的写本各自具有不同的时代风格，不同地区的写本也体现出不同的地方特色，可以说，数万件敦煌写本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国民间书法艺术史。此外，敦煌写本中还有相当数量的名碑、名帖作品，与传世本又有所不同，是探讨书法史上千年名家书风的珍贵资料。

唐代敦煌写本书法

唐代是一个雄强、宏大的时代，书法也众体兼备，初唐有欧、虞、褚、薛四家，继承了南北朝以来的书法艺术成果，他们大都出于二王，同时又都注意学习北朝的书法，形成了一代新风。从敦煌隋代写卷中就可看出有类似于欧阳询、褚遂良等名家的书体，时代却早于这些名家，反映了隋及初唐书法艺术的基本审美趋向。整个唐代，欧、虞、褚、薛四家的影响极为广泛。盛唐以

后，书法开始崇尚丰肥，以颜真卿为代表的雄强、浑厚的书风流行开来，即便是写经体的小楷，也有写得丰厚凝重者。而柳公权虽然书法承袭颜体的很多特点，但又改变了颜体过于肥厚的风格，显得瘦硬而险劲。总之，唐代写经书法艺术风格呈多样的局面，体现出博大恢宏的气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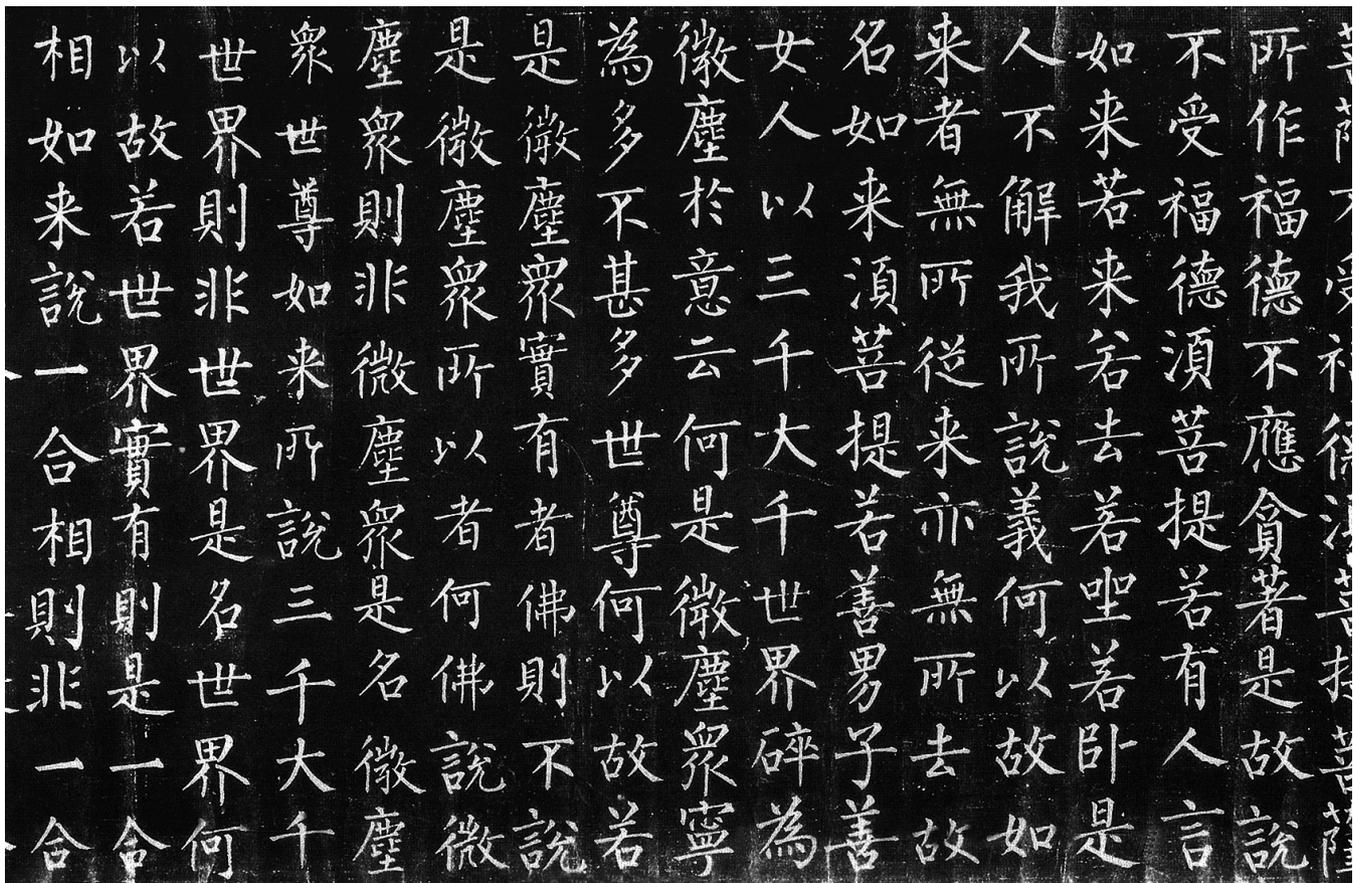
敦煌写本中的唐代书法资料十分丰富，在此介绍几件书法名家名作，对于我们认识唐和唐以前的书法名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唐人临王羲之《十七帖》残页，共有三件，巴黎藏一件，为《旃闾帖》(P.4642)，伦敦藏有《瞻近》、《龙保》(S.3753)二帖。二者书写风格一致，应出于同一人手笔。唐太宗崇尚王羲之的书法，收集了王羲之的一些字帖共28种，并翻刻流传于世，因第一帖首行有“十七”二字，故称“十七帖”。唐以来，《十七帖》对于人们认识和学习王羲之的书法具有重大的影响，因而此

帖历代翻刻极多，现传世的主要是“淳化阁帖”本。敦煌《十七帖》残卷为唐人临本墨迹，字型结构等方面与“淳化阁帖本”稍有差异，而用笔浑圆流利，比起刻本更神采生动。与传世的刻本相对照，便能够更全面理解王羲之的书法的真实面貌。

隋代智永禅师，深得王羲之的真传，隋唐之际，人们学书法往往以他的《真草千字文》作为临习的范本。他的书法在当时流传很广，但到了唐代，就很难见到真迹了，流传至今的《真草千字文》有两种，一种是日本所藏的唐临本，另外是北宋和南宋刻本。敦煌写卷中有《蒋善进临真草千字文》(P.3561)，现藏法国巴黎，前部从“帷房纨扇”开始至结束，正文共34行，真草各170字。尾存题记：“贞观十五年七月临出此本，蒋善进记。”结构谨严，刚柔相济，与现行的北宋刻本比较，草书更显得浑厚、雄健。

敦煌文献中还有几件唐代的书法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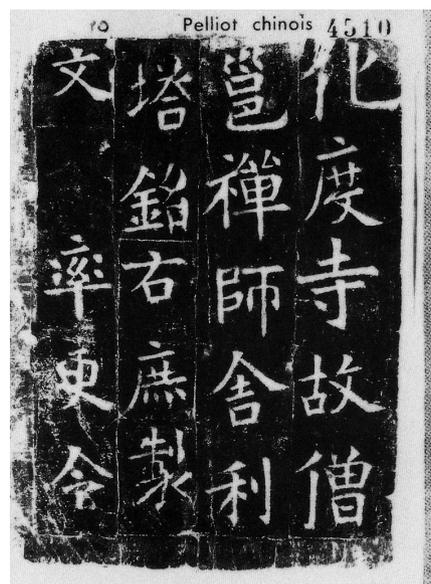
柳公权《金刚经》拓本 法国图书馆藏 (P.4503)

本：唐太宗书《温泉铭》(P.4508)，为唐拓唐裱剪装本，现藏巴黎。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宗自撰“温汤碑文”(即《温泉铭》)，并刻碑保存，原碑早已失去，宋代以后，仅有文献记载，无法见到原件，直到藏经洞的发现，这件作品才公诸于世。这件拓本存后半部分计50行字。尾附墨书：“永徽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圜谷府果毅(下缺)”，永徽四年距立碑后才五年，是为可靠的拓本。唐太宗喜爱右军书，在书法上也颇著功夫，著有《笔法诀》《论书》等理论著作，他的《晋祠铭》《温泉铭》刻碑传世，对于碑刻来说是一大创举，因为碑刻的字体向来是以庄重的隶书和楷书为主，此前没有行草书刻碑的。自太宗以后，行书勒碑之风也纷纷兴起。《温泉铭》中不难看出王羲之书法的影响，其笔迹圆劲

流利，道媚中不乏机敏，秀丽中见出恢宏之气，是行书的上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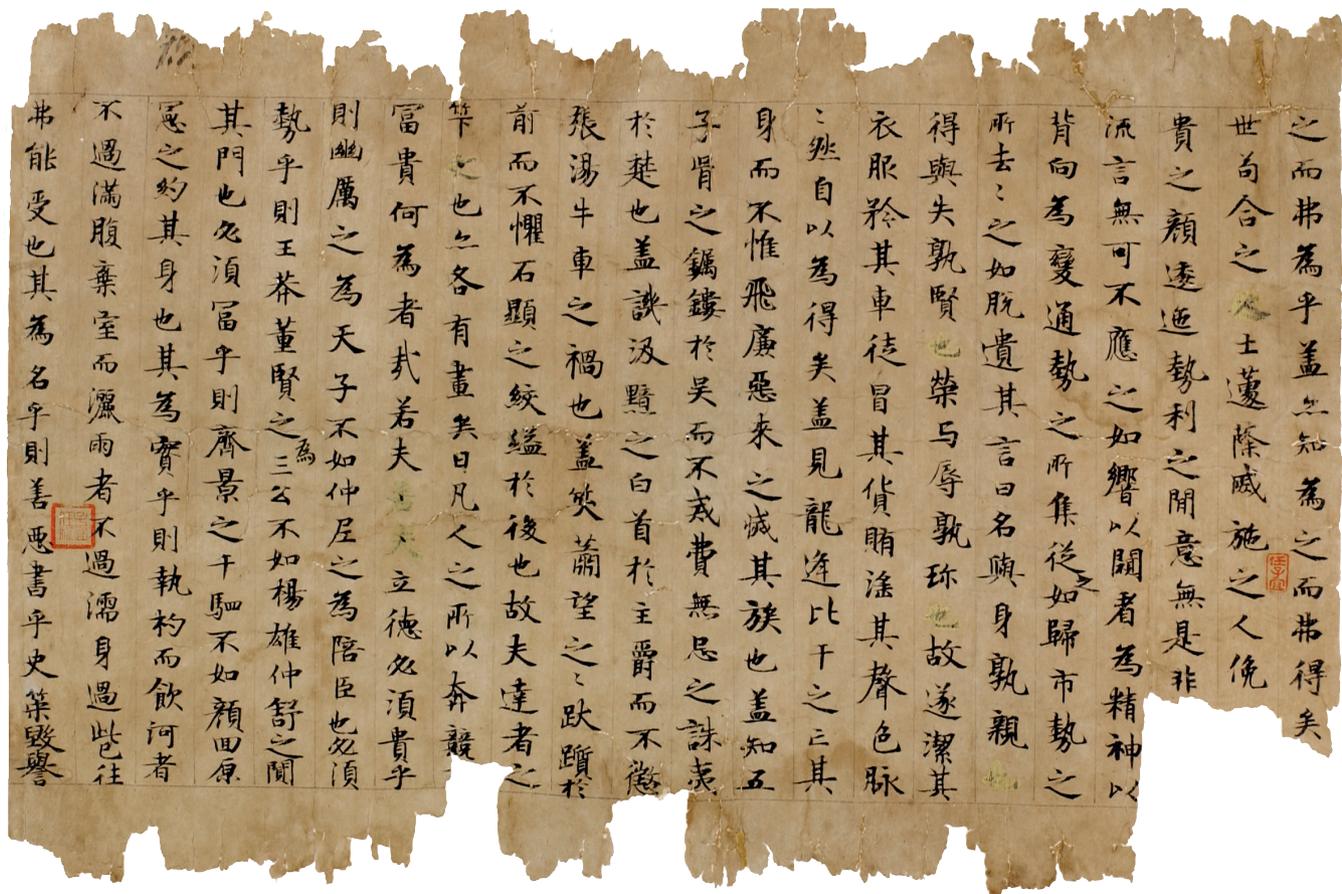
欧阳询《化度寺塔铭》(P.4510, S.5791)，全称《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唐李百药撰文，欧阳询书，贞观五年(631)立石，历来被认为是欧体书法中优秀之作，原石早已佚失，传世有多种本子，大多经历代翻刻，未免失真，只有敦煌本为唐代拓本，最接近原作。此件拓本现存英、法两处，前两页存法国。后十页存英国，每页四行，行五字，风格古朴，锋颖如新，从中可以看出欧阳询清逸、劲秀而又险峻、奇崛的书风。

唐拓柳公权《金刚经》(P.4503)书风险劲。据《金石录》记载，柳公权曾书《金刚经》于西明寺，有会昌四年(844)刻本、大中十三年(859)刻本。敦



欧阳询《化度寺塔铭》拓本 法国图书馆藏 (P.4510)

煌本《金刚经》拓本首尾俱全，卷末注明为长庆四年(824)刻，此本未见著录，而时间又比前两种刻本都早，愈显得珍



《文选·运命论》敦煌研究院藏(敦研0356)

贵。这件作品笔力瘦硬，字体端严，从中可以体会到柳体书法注重骨法、笔力刚健的风格。

以上碑帖大都是唐时流传至敦煌的法帖，反映了中原最新流行的书法艺术对敦煌本地的影响。除了这些名家的法帖外，内地的写经大量流传至敦煌，而唐代敦煌本地的写经水平也并不亚于内地。敦煌研究院藏的《佛说大药善巧方便经》(敦研0336)写卷，前残，卷末有后人书上元初的题记，若从高宗上元年算起，至迟在公元762年以前，本卷已经写成。另外，此卷与法国所藏P.3791为同一写卷，被人为地分成了两段。这个写卷用硬黄纸书写，有极细的乌丝栏，楷则淳熟，章法严谨，笔法刚劲。P.3831《三藏圣教序》书法则含蓄润畅，作风和穆，具有褚遂良一路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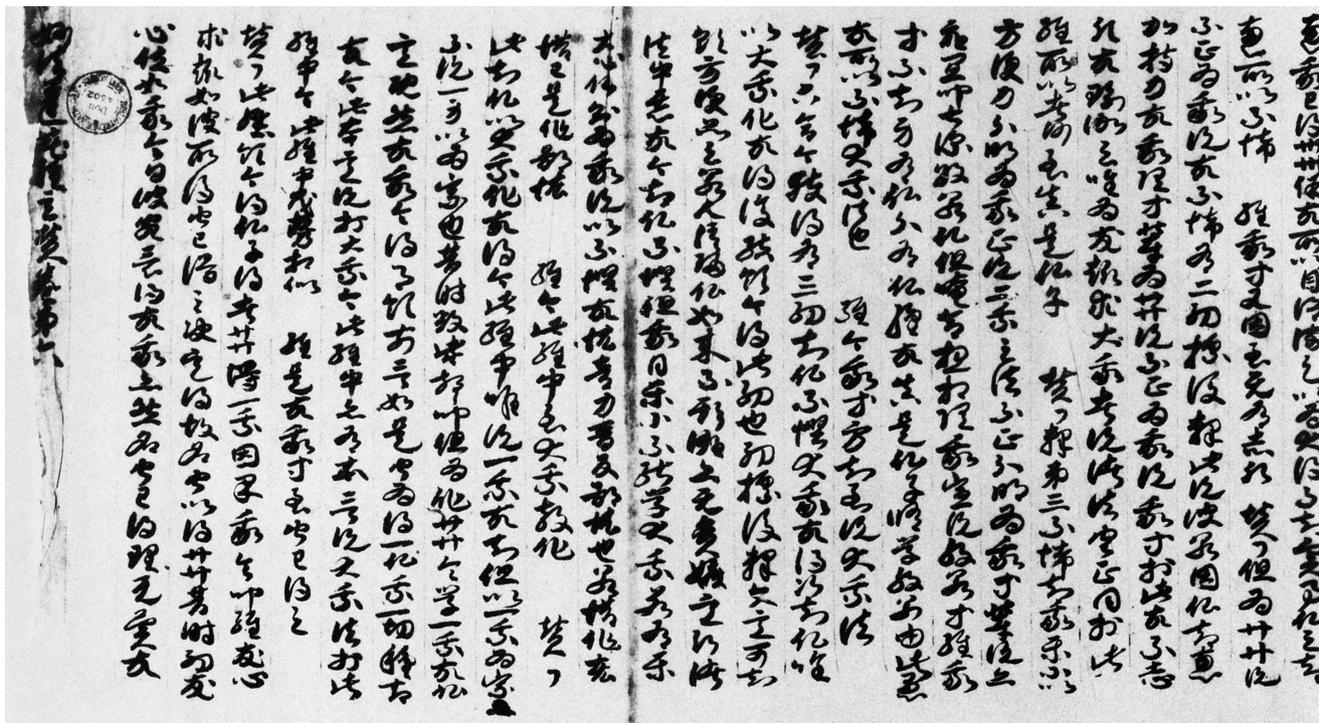
风。据《佛祖统记》记载，武则天曾于久视元年(700)诏义净于东都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天后制《圣教序》，这个写本就是武则天时期的写本，前残，存22行，尾全，所存的这部分与《全唐文》所录《圣教序》没有大的差别。

唐代的道经写卷也具有很高的书法价值，唐朝皇帝认为老子是李家的祖先，所以格外崇奉道教，因而道经广为传抄流播，敦煌写本中的道经书法水平都很高。

写于开元廿三年(735)的《阅紫绿仪》(P.2457)，从卷末的题记中，可以看出是写于河南府弘道观，又经京景龙观上座和大德的校对。可见书手不是等闲之辈。本卷书法醇厚流畅，雍容和穆。道经中还有《太玄真一本际经》和《无上秘要》等写卷书法较优秀。《无

上秘要》是成书于北周时期的道教类书，敦煌写本P.2602《无上秘要》尾题：“无上秘要卷第廿九，开元六年(718)二月八日沙州敦煌县神泉观道士马处幽并侄马抱一……”神泉观是当时敦煌著名的道观，现存的敦煌写本中尚有马处幽、马抱一抄写的道经多件。他们的书法笔致丰腴，结构端庄，是优秀的楷书写本。从这些写本中可以看出，唐代的敦煌在书法艺术上与内地并没有多大的差距。

儒家经典在敦煌文献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大多是文人所书，其中自有一种“书卷气”。此外还有一些文学作品，看起来也是读书人所写，与寺院的写经迥然不同。P.2540和P.2562《春秋左传集解》。敦煌所出《春秋左传》写本，杜预集解本达26卷，其中有不少与



《法华经玄赞》法国图书馆藏 (P.2176)

传世本《春秋左传集解》文有出入，可互相校勘，具有文献价值。《春秋左传集解》的写本大多书写工整，P.2540和P.2562写卷是较优秀的。这两个写本书法和畅，刚柔和度，结体严谨，气度雍容。P.2562写卷中“世”字避讳，有的专家认为是初唐所写，从书法风格来看，两件都是唐前期的风范。

P.2617《周易经典释文》(738)结体开朗雍容，笔法刚劲而浑厚，具有颜《勤礼碑》之风，而颜真卿此时还不到20岁，《勤礼碑》的完成，更比此卷晚了40年，说明一个时代书法家总是从民间吸取很多有益的成分来丰富自己。

敦研0356《文选·运命论》，仅存一纸，共22行。据研究，法国藏的P.2645卷《文选·运命论》正好与本卷相接，法国藏卷存34行，为前半部分。这件《文选·运命论》写本笔法劲健而娴熟，间距疏朗，虽小楷而气势开张，颇有褚遂良书法的风致。有的论者认为是隋代的写本，从其字体结构的成熟，

楷则的谨严等方面看，恐怕应是初唐的写卷。

唐代还出现大量的草书写卷，P.2176《妙法莲花经玄赞》。唐玄奘的大弟子窥基曾著《法华玄赞》，这是唯识宗的重要理论之作。此卷全用草书写成，笔势流转，生动自然。草书写卷尚有S.5478《文心雕龙》等写卷行笔流利，气势畅达，跌宕变化，多有奇趣。

唐代的敦煌写卷书法风格纷呈，丰富多彩，可以说是中国书法史上辉煌的一页。唐以后，五代、宋的写本仍保存不少，但从书法艺术上看已走向衰落，缺少唐代那种旺盛的创造力和严谨而细腻的精神，除了一些官府文件还保持一定的水平，其余的书法水准都不太高。总体来说，敦煌写本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写本书法真迹，特别是两晋南北朝到隋唐时代，正是中国书法成为独立的艺术并急速发展的时代，从钟繇、二王到唐代的欧、虞、颜、柳，名家辈出。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六朝书家的真迹极少，

唐代书迹虽然相对较多，但颜、柳等名家书法也多存于碑版之中，墨迹很难见到。而敦煌写本基本上都是毛笔写成，比起碑刻来，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敦煌写本书法虽为名不见经传的民间书手所写，但其广泛的民间性和丰富的艺术特点，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书法的内涵，也改变了人们对中国书法史的认识。

注：

敦煌写本由于流散在世界各地，各地的收藏者都对这些文书进行编号，本文采用通行的编号形式，即英国图书馆藏品，源于斯坦因收集品，用字母S表示；法国图书馆藏品，源自伯希和收集品，用字母P表示；国内收藏敦煌写本，国家图书馆藏品，简称“国图”；敦煌研究院藏品，简称“敦研”；敦煌市博物馆藏品，简称“敦博”；甘肃省博物馆藏品，简称“甘博”。

(作者为敦煌研究院研究员)

德艺双馨的国画家、古画临摹家冯忠莲

文 / 欣 然



冯忠莲（1918—2001），女，祖籍广东顺德，生于天津。1988年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早期从师于陈少梅，后与陈少梅结为伉俪。1953年迁居北京，任教于启新小学。嗣后，荣宝斋聘她临摹古画，并兼任编辑室科长，后调入故宫博物院专门从事摹制古画工作。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画研究会会员。出版有《古书画副本摹制技法》。

2008年10月31日，故宫博物院和中央文史研究馆在故宫联合举办“纪念冯忠莲先生诞辰90周年座谈会”。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中央文史研究馆有关领导、专家、学者及冯忠莲先生的亲属、同事、学生80余人参加了座谈会。各方代表在发言中对冯忠莲先生的艺术成就和道德风范予以高度评价，一致认为冯忠莲先生是德艺双馨的画家，是成绩卓著的古画临摹家；冯

忠莲先生的一生是艺术家的一生，是良师慈母的一生，是淡泊名利、甘当无名英雄的一生。

冯忠莲，著名画家陈少梅先生的夫人，祖籍广东顺德，1918年8月14日生于天津。祖父冯商盘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来天津，20世纪初为旅津巨商，曾任礼和洋行（德商）、中国通商银行经理，后父亲疾病缠身不能工作，自此家道中落，1921年父亲去世。冯忠莲幼年入天津圣公小学，继入圣公中学读书，1936年入天津女子师范学校文学系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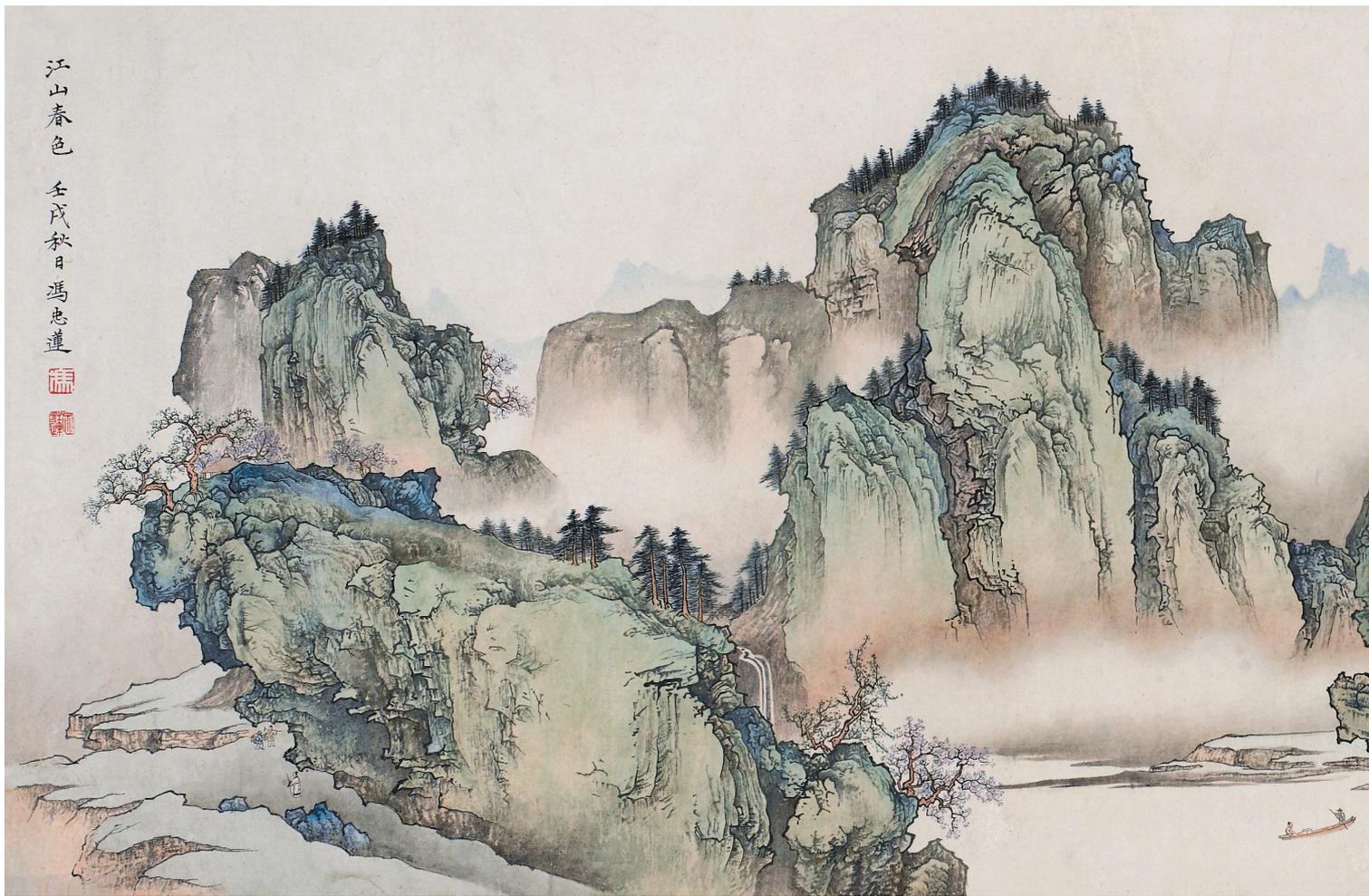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军侵占华北，女子师范学校校舍被日寇的炮火焚毁，冯忠莲至此失学赋闲在家。后来一个偶然的机，听闻此时陈少梅先生避居英租界以“陈少梅画社”名义课徒鬻画，遂与友人相约报名拜陈少梅为师，从此步入画界。1938年冯忠莲考取北平辅仁大学美术系，在大学的三年里，她学习勤奋、刻苦努力，除认真听溥雪斋、启功、溥松窗、汪慎生等先生讲课外，还用心临摹陈少梅先生寄来的画稿，每年考试成绩都位居全班第一，曾被誉为美术系的“女状元”，受到学校的奖励，校长陈垣亲自为她颁发奖状。1941年冯忠莲大学毕业继续师从陈少梅先生学习国画，后与陈少梅结为伉俪。

新中国成立初期，冯忠莲在天津实验小学任教，取得显著成绩，曾被评为

天津市“模范教师”。1953年，冯忠莲与陈少梅一起迁居北京。1954年3月，冯忠莲受聘荣宝斋临摹古画，兼任荣宝斋编辑室副主任。1972年，调故宫博物院继续从事临摹古画工作，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88年12月25日，冯忠莲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冯忠莲先生还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画研究会会员，北京市第二、三、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冯忠莲师从陈少梅学习国画十几年如一日，心无旁骛，较为全面地承袭了陈少梅的绘画技法，笔墨功力深厚，其作品《江南春》《涛声》参加了第一、二届全国美术展览，深受好评。但是冯忠莲先生并没有单纯搞创作成为“著名画家”，这或许正是冯先生的伟大之处。1953年冯忠莲应荣宝斋之聘到辽宁博物馆临摹《宋赵佶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卷》，从此与古画临摹结下了不解之缘，投身于新中国的古画临摹事业，冯忠莲先生是这一事业的开拓者之一。1954年，冯忠莲正式调到荣宝斋工作。1972年，冯忠莲又调故宫博物院专门从事摹制古画，直至1985年在故宫博物院退休。其间，她先后临摹了明·仇英的《白马如风疾图》、蓝瑛的《山水图》，清·袁跃的《万松叠翠图》等。1972年，她还与刘炳森先生合作临摹了《长沙西汉马王堆一号墓帛画》。

在临摹古画方面冯先生最值得称赞



冯忠莲 江山春色 镜心 34cm×103.5cm 纸本 设色 1982年
款识：江山春色。壬戌秋日，冯忠莲
铃印：冯（白文） 忠莲（朱文）

的就是成功地临摹了《清明上河图》全卷。《清明上河图》是北宋杰出的现实主义画家张择端以当时京城汴梁（今开封）为背景所绘的长卷，高24.8cm，长527.8cm，画卷从郊野春光到繁忙的码头、热闹的街市，生动细致地展现了宋徽宗宣和年间汴京的市井百态和繁华景象，规模宏大，绘画技艺高超。临摹《清明上河图》对传承和保护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临摹这样一件古代名画不但需要艺术功力，还需要一般人做不到的献身精神。1960年，冯忠莲满腔热情地接受了临摹《清明上河图》的工作。她在感到光

荣的同时，也意识到责任的重大，复制这样一幅规模宏大的画卷，线条的刚柔粗细，笔墨的干湿浓淡等都要力求与原作保持一致，这需要付出很大的精力。冯忠莲全力以赴，早出晚归，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从不间断对《清明上河图》的临摹工作。然而，“三年困难”“四清运动”使临摹工作出现断断续续；“十年动乱”更使临摹工作被迫停止；直到1976年拨乱反正才得以继续。这时冯忠莲先生已年逾花甲，患有高血压和眼底血管硬化症，而且临摹已经中断十年，绢素、色彩都有很大的变化。冯忠莲克服重重困难，以精湛的

技艺，顽强的毅力，保持了摹本前后的一致，丝毫看不出中断后衔接的痕迹。1980年9月，《清明上河图》的临摹工作终于大功告成，艺术效果和古旧的面貌几可乱真，获得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清明上河图》摹本被故宫博物院列为一级文物。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刘九庵在澄观堂题语中说：“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为显赫巨迹，名播中外，现代摹本首推冯忠莲，她是故宫博物院藏张择端真迹对照临摹，毫发不异，可谓不下真迹一等。”

古画临摹是传承和保护文物的事，冯忠莲先生不仅是这一事业的开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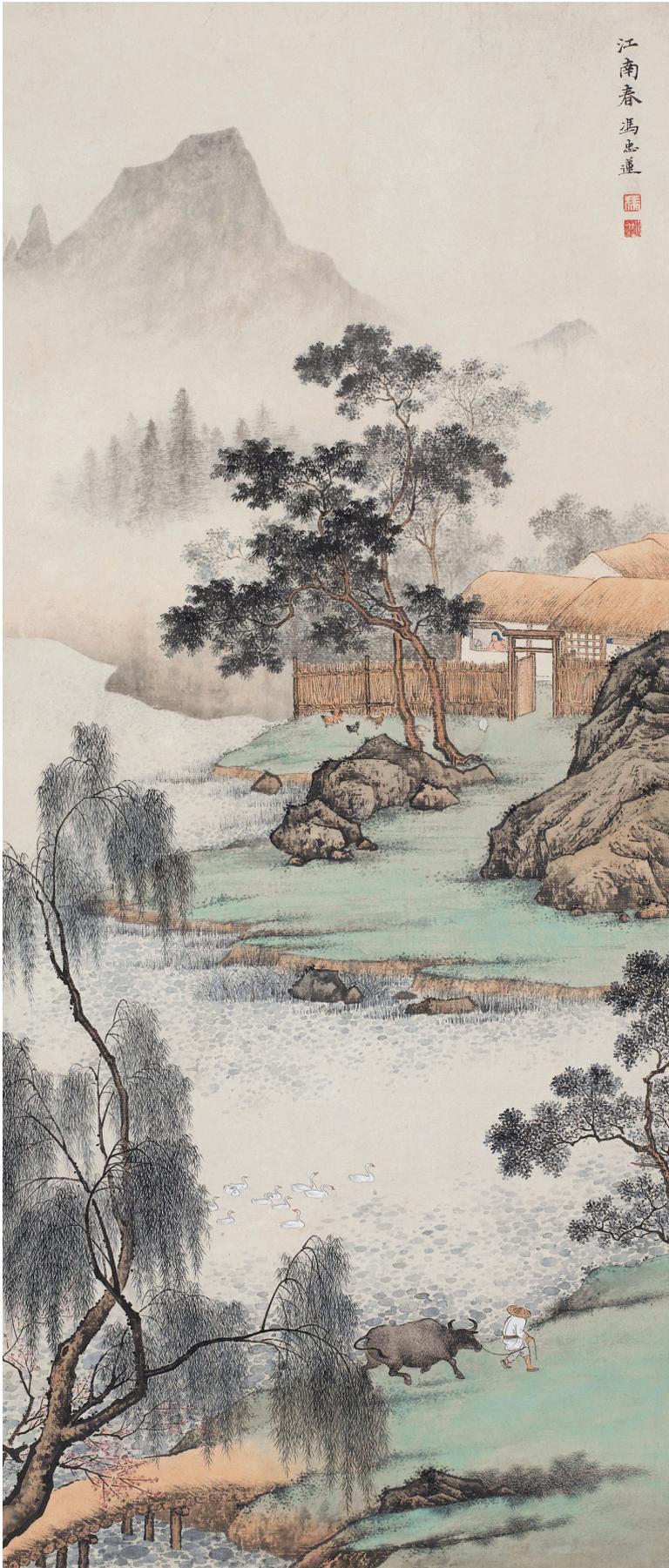


者，还毫无保留地把这一绝技传授给后人。她是一位良师，对学生言传身教，在绘画及临摹技法上严格要求学生，她要求弟子学画要先打好扎实的基本功，教弟子潜心练习勾描，体会笔墨情趣，练就熟能生巧的本领；她教学生着色的运用，石青、石绿、朱砂等重彩的加工研磨技巧，反复示范、指导，直到弟子们全都掌握为止。她先后带过12个弟子，都一一把他们培养成年轻的古画临摹家。

冯忠莲是陈少梅先生的学生和夫人，与陈少梅志同道合。1954年9月，陈少梅先生英年早逝，这对冯忠莲及其

家庭是个沉重的打击。当时家境贫寒，一家八口蜗居在烂漫胡同“湘乡会馆”里的一间不足20平米的平房。冯忠莲又是一位十分坚强的女性，她毅然挑起家庭的重担，在家里悉心照料子女，含辛茹苦、精打细算地维持生计。虽然没有大米白饭，但全家能勉强吃饱穿暖，尽管“萝卜赛过梨”，但晚饭后通常会有“水果”来补充营养，尽管袜子上补丁层层，但没有让孩子光着脚丫，更没有让孩子出现辍学。冯忠莲先后赡养3位老人，把4个子女全部抚育成才。作为一名艺术家，从其生活上可见其精神的博大。

冯忠莲平生还怕麻烦别人。2001年5月她病重时还嘱咐家属不要惊动领导和同事，当中央文史研究馆的王海荣副馆长闻讯赶到医院看望她时，处在半昏迷状态的冯忠莲仍旧说：“又麻烦你们了！不敢当！不敢当呀！”。2001年5月6日，冯忠莲先生与世长存，享年82岁。冯忠莲先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她用毕生的精力为我国的古画临摹事业做出突出的贡献，她以德艺双馨的人格魅力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重。



冯忠莲 江南春 立轴
79.3cm×33.5cm
纸本设色 1953年
款识: 江南春。冯忠莲
铃印: 冯(白文) 忠莲(朱文)



冯忠莲 木兰从军图 立轴
67cm×33cm 纸本 设色 1948年
款识：木兰从军图。戊子元月，冯忠莲
铃印：冯（白文） 忠莲（朱文）



冯忠莲 秋山望云图 立轴
113cm×54cm 纸本 设色 1991年
款识：冉冉木叶下，萧萧山水秋。浮云带田野，落日抱汀洲。一九九一年十月，岁次辛未深秋，写秋山望云图并录宋王安石“舟中读书”一首于京郊团结湖畔晴窗并记。
顺德冯忠莲
铃印：冯忠莲（朱文） 春秋笔（白文）
年近七旬（朱文）



冯忠莲 观音造像 立轴 纸本设色
款识：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癸未七月冯忠莲沐手
敬绘并题
铃印： 忠莲（朱文）

宋代山水画的传承与创新

——以泰山山水画的创作为例

朱琳博

(济南市历城区文化馆, 副研究馆员, 济南 250101)

【摘要】宋代山水画在构图理法、笔墨语言与哲学意蕴方面确立了中国山水画的核心范式, 其“天人合一”思想与严谨的笔墨体系成为后世创作的重要参照。文章在介绍宋代山水画和当代泰山山水画风格与意蕴的基础上, 通过对比分析明确了泰山山水画对宋代山水画的传承与创新, 为进一步把握宋代山水画与当代泰山山水画的内在关联性提供参考。

【关键词】宋代; 当代; 泰山; 山水画; 传承与创新

【中图分类号】J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 (2025) 18—034—04

作为中国传统绘画的重要类型, 山水画自唐代发展起便逐步确立了以表现自然山川为主体、寄托人生哲思与审美理想的艺术传统。至宋代, 山水画在构图理法、笔墨技法、色彩运用与意境营造等方面日臻成熟, 形成了极具系统性的审美体系, 尤其强调“天人合一”“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的创作理念, 对后世山水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近年来, 众多艺术家在创作泰山山水画时, 大量借鉴宋代山水画的构图方法与笔墨语言, 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现实情境与个人表达进行创新, 逐步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与时代精神的当代表现形式。为进一步明确泰山山水画对宋代山水画的传承与创新, 本文开展了相关研究。

一、宋代山水画的风格与意蕴

宋代, 社会的相对稳定与科举制度的完善, 促使文人阶层崛起。而文人群体将绘画视为个人修养与情感表达的重要手段, 强调“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 这种文化氛围推动了山水画的发展^[2]。另外, 这一时期道家“道法自然”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广泛传

播, 促使部分文人画家在创作中融入自己的一些哲学思考, 从而形成了风格独特、意蕴深厚的山水画。

(一) 雄浑壮阔

宋代山水画以雄浑壮阔著称。画家们通过描绘山体的高大险峻和雄伟气势, 来展现自然的威严与神圣, 同时也表达自己对自然的敬畏之情及对宇宙人生的深刻思考。以图1所示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为例, 画中, 巨碑式的山体占据主体位置, 山峰高耸入云, 云雾缭绕其间, 展现出山体的雄伟气势和高大神秘的氛围。而且, 通过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墨色, 运用“雨点皴”技法, 使山体显得更加雄浑有力, 展现了山体的坚硬与险峻。

(二) 以“三远”法营造空间感

宋代山水画家善用“三远”法(高远、深远、平远)构建山水空间图卷。关于“三远”法, 郭熙在《林泉高致》中如此描述: “山有三远: 自山下而仰山巅, 谓之高远; 自山前而窥山后, 谓之深远; 自近山而望远山, 谓之平远。高远之色清明, 深远之色重晦, 平远之色有明有晦。”^[3]这种具有透视观察效



图1 溪山行旅图 范宽

果的空间效果营造方法, 使自然物象合理再现, 并且是以很强的空间感和层次

感形式再现。例如，图1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中，借助“三远”法的运用，画面中的山体层次分明，空间感强烈，观赏时，仿佛置身于山水之间，感受到大自然的广阔与深邃。

（三）色彩细腻

色彩方面，宋代山水画展现出了极高的细腻度和层次感。尤其是在绢本设色的技法中。例如，郭熙的《早春图》中不仅有丰富的墨色层次，还通过设色技法表现了早春时节的生机与活力。画家在山体、树木和云雾等部分巧妙地运用了淡彩，使画面在保持水墨画的意境的同时，又增添了色彩的丰富性。这种色彩的运用不仅增强了画面的视觉效果，也使画家能够更好地表达内心的情感和对自然的理解。此外，宋代画家在设色时也十分注重色彩的层次感，通过不同深浅的色彩来表现自然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例如，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中，山体的阴影部分和远处的山峦上使用了淡墨和淡彩，使画面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由近及远、由浓到淡的层次感，增强了画面的深度和立体感。

（四）笔法灵活多样

宋代山水画中，画家通过不同的笔法表现自然景观的丰富质感和生动气韵。例如，范宽《溪山行旅图》中运用了“雨点皴”技法，以短促而有力的笔触表现山石的坚硬与质感，使山体显得雄浑有力。而郭熙则擅长“卷云皴”，以柔和的曲线和变化的笔触描绘山体的圆润与层次，赋予画面以流动的韵律感。此外，宋代画家还善于运用中锋、侧锋、逆锋等多种笔法，通过浓淡、干湿的墨色变化，表现出山石的纹理、树木的枝干以及云雾的虚实^[4]。这种灵活多样的笔法不仅丰富了画面的表现力，也使画家能够更好地传达内心的情感和

对自然的理解，体现了宋代山水画在艺术表现上的高度成熟。

（五）富有哲学内涵

宋代山水画深受道家 and 儒家思想的影响。道家崇尚自然，讲究遵循天地万物的运行规律，相信自然本身就是道的体现；儒家则认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应顺应自然并与自然融合^[5]。受这些哲学思想的影响，画家们创作的山水或多或少地有通过描绘自然景观表达对自然的敬畏和对宇宙人生思考的内涵。例如，郭熙的《早春图》不仅展现了自然的生机与活力，还传达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画面中，通过对早春山水的描绘，展现了自然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这种哲学思想的融入，使山水画不仅具有艺术价值，更具有深刻哲学内涵。

二、当代泰山山水画的风格与意蕴

泰山山水画是在传统山水画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艺术表现形式。它不仅承载了泰山的自然形象和文化象征，也融入了当代艺术家的审美意识、时代感悟与个人情怀，进而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地域精神的艺术风格。

（一）构图宏伟庄严

泰山山水画多以全景式构图为主（如图1），强调画面气势的恢宏与构造的完整，突出泰山山体的高峻与巍峨。画家常选取玉皇顶、天街、南天门、十八盘等泰山的标志性地貌，通过俯瞰、仰视或纵深构图的方式来表现其雄伟磅礴的山势，使观者能够感受到“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审美震撼。构图方面，画家讲究山体的重叠起伏与动静结合，使画面既稳重又富有变化，进而体现泰山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高度。

（二）笔墨厚重

当代泰山山水画在笔墨运用上趋向



图2 北宋郭熙《早春图》朱琳博临

厚重、沉稳。画家们广泛使用积墨、复皴、干擦等技法，以增强山体的质感和量感，体现泰山坚实不动、静穆庄严的审美特征。笔墨不仅服务于形体描绘，更承载着画家对山石结构的理解和精神意象的建构。一些作品在用笔上粗中有细、气势连贯，表现出泰山的阳刚之气与沉稳之势。墨色层次丰富，从浓重到淡雅、从实到虚，传递出画家对山岳神韵的感知与领悟。

（三）设色语言丰富多样

随着绘画材料与观念的拓展，当代泰山山水画在色彩运用上逐渐摆脱传统的设色局限，形成了兼具装饰性与表现力的色彩语言。部分作品采用水墨淡彩表现泰山的清逸之美，亦有画家使用重彩、矿物色、金粉等手段强调泰山的神圣庄严与自然辉光。尤其在表现春夏繁茂、秋冬沉静等季节变化时，色彩既真实再现了自然，又赋予画面以情绪引导和象征意义，使观者在色彩中感受到泰山的生命律动。

（四）情景交融

当代泰山山水画不止于描绘山水形



图3 山魂 朱琳博



图4 山魂(局部) 朱琳博

貌，更注重景物与情感的交融，构建主客互动的艺术意境。画家往往借泰山之景表达个人的思想寄托、精神追求或时代情怀，画中山水既是自然之象，又是情思之境。在画面中，苍松古柏、云雾流泉、庙宇人影等元素与山势相呼应，强化了画面的文化厚度与历史感，体现出人与自然、人与神灵、人与历史之间的深层对话，形成独特的文化景观和情感共鸣。

（五）富有时代精神与文化内涵

在当代文化语境下，泰山山水画不仅是自然景象的再现，更是民族精神与时代价值的重要象征载体。作为中华民族五岳之首，泰山历经几千年的祭祀活动、文化积淀与社会变迁，已成为中华文化中“稳重、崇高、坚毅”的精神象征。如今的泰山山水画作品，越来越多地融入了对现实社会、时代精神的回应与文化命题的表达。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当代画家将“挑山工”这一具象形象引入泰山山水画中，以写实或写意的方式表现挑山工攀登陡峭山路、肩挑百斤货物上下山的场景。这些身影虽渺小，却构成了泰山精神最朴素而坚实的象征。他们坚韧、执着、不畏艰难的劳动形象，与泰山本身的沉稳、不动如山的

气势相契合，寓意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勇于承担的时代品格。

三、泰山山水画对宋代山水画的传承与创新情况分析

当代语境下，许多画家以泰山为主题进行艺术创作，在承继宋代山水画构图逻辑、皴法语言和“天人合一”审美理念的同时，也结合现实关怀与个体感悟，对传统语言进行适度调整与拓展，逐步形成具有现代意识和地域精神的艺术面貌。因此，泰山山水画表现出对宋代山水画传承与创新的特点。

（一）构图理法的继承与空间结构的革新

宋代山水画在构图上极为讲究，以“三远法”构建出具有秩序感与哲学性的空间结构，传达自然之势与天地之理。部分当代画家在创作泰山山水画时吸收了这一构图理法，尤其在描绘泰山山体的纵深高耸、重叠绵延之势时，大量地采用“高远”“深远”等传统处理方式，表现其神圣庄严与崇高品格。当然，现代画家也不完全拘泥于一种单一视角或结构方式，而是借助散点透视、交叉空间、局部特写等多元构图策略，使画面空间更富节奏感与叙事性。部分画家甚至采用鸟瞰视角、镜头切换等现

代视觉手段，突破宋人“全景式山水”的稳定构图格局，使山水画由“静观世界”向“动态精神场域”转变，从而形成了具有当代特征的空间表现力。

（二）笔墨技法的沿用与表现语言的重构

宋代山水画的笔墨系统较为成熟。并且，不同画家拥有自己较为完整的笔墨技法及明显特色。例如，范宽的“雨点皴”，李成的“牛毛皴”，郭熙的“卷云皴”等。这些均体现出自然与技法的高度统一。当代泰山山水画中延续了这些皴法的笔意与质感表达，通过积墨、破墨、干皴等方式表现泰山的坚实肌理与重量感，体现出“厚重如山”的视觉气场。但是，当代画家也重视笔墨作为个性表达与思想传达的媒介功能。他们在传统技法基础上，融入泼墨、泼彩、刮墨、复皴叠染等现代材料语言，甚至跨媒介尝试肌理纸、金属粉、宣纸肌理叠加等手段，使笔墨不再只是“再现自然”的工具，而是“创造意象”的手段。通过笔墨语言的重构，泰山不仅“可见”，更“可感”“可悟”，从而赋予了山水以更深的精神穿透力。

（三）意境营构的传承与内涵维度的拓展

宋代山水画在意境方面强调情景交融、物我两忘。画家多以山水写怀寄志，追求“静观”与“空灵”。当代泰山山水画在这一维度上显现出延续与突破的双重路径。一方面，画家在山形走势、气象布局、云烟变幻等方面仍以“写意抒怀”为旨归，力图营造出具有“天人感应”意味的精神场域。另一方面，泰山山水画的意境构建不再局限于个体生命体验的投射，而是融入了民族精神、社会责任与时代价值。例如，挑山工群体作为泰山精神的真实化身，频

繁出现在画面中。这些“平凡中的崇高”形象，与自然山体构成一种隐性的象征结构，表达了人民性与历史性的统一，使传统“文人意境”发展为更具广泛认同感的“时代意境”。

（四）哲学内涵的传承与思想主题的转化

宋代山水画深受道家“道法自然”、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滋养，讲求通过自然描绘表达宇宙观、人生态度与终极思考。当代泰山山水画对这些哲学内涵进行了再解读与再演绎。一方面，仍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画中体现出对生态环境、自然力量的敬畏。另一方面，在表达重心上从“个体修养”走向“社会关注”，思想主题更趋多元。而且，当代泰山山水画作品往往带有更强烈的文化自觉与现实关怀。诸如生态保护、文化记忆、民族认同、劳动精神等议题，成为山水画的重要思想内核。例如，挑山工象征着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通过艺术表达，转化为新时代背景下对民族精神与文化根性的再认知。这种思想转化，标志着山水画已由“自然写照”上升为“时代表述”。

（五）图像符号的借鉴与文化语义的重构

宋代山水画中常见的文人、樵夫、茅庐等意象，是特定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的图像表达^[6]。而当代泰山山水画则积极进行符号的再造与文化语义的重构。一方面，延续泰山作为“文化地标”与“精神高地”的图像象征。另一方面，通过现代语境下的新符号——如挑山工、游人、碑刻、庙宇、气象观测站等的融合，拓展了山水画的叙述维度与文化厚度。这种由“隐逸”向“共生”、由“文人”向“人民”的意象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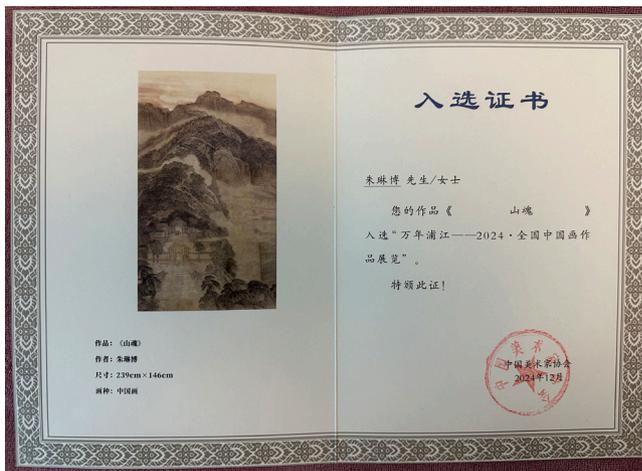


图5 中国画《山魂》作者：朱琳博 尺寸：239*146cm作品入选“万年浦江—2024.全国中国画作品展”

变，不仅赋予了泰山山水画以更新的文化承载功能，也使中国山水画实现了从传统美学向当代表达的跨越。

四、结语

作为中国画中的重要类型，山水画携带了丰富且深刻的时代内涵。宋代作为山水画发展的黄金时期，在风格与意蕴方面有突出的表现。这主要体现为内容雄浑壮阔，以“三远”法营造空间感，色彩细腻，笔法灵活多样，富有哲学内涵。而作为山水画的延续，当代泰山山水画的构图宏伟庄严，笔墨厚重，设色语言丰富多样，情景交融，且富有时代精神与文化内涵。对比发现，虽然时代不同，但泰山山水画对宋代山水画进行了传承和创新。这主要体现为构图理法的继承与空间结构的革新，笔墨技法的沿用与表现语言的重构，意境营构的延承与内涵维度的拓展，哲学内涵的传承与思想主题的转化，图像符号的借鉴与文化语义的重构。这些也使得我们可以从山水画的整体视角审视宋代山水画与当代泰山山水画的关系。

参考文献：

[1]杨怡炜,颜海强.宋代山水画的艺术精神及技法在中国当代油画中的应用[J].

美术教育研究,2023(8).

[2]王丹舟,徐炳声,金五德.宋人画论[M].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

[3]郭熙.林泉高致[M].周远斌,点校纂注.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

[4]卞俊鑫.宋代写意山水画之笔墨语言技法及审美意蕴研究[J].艺术评鉴,2023(23).

[5]张喆舜.宋代山水画的意境与多元解读——以《溪山行旅图》为例[J].大观,2025(4).

[6]王茅伊.宋代山水画造境与科幻式景境的空间研究[J].艺术市场,2024(9).

作者简介：朱琳博（1971—）女，2000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就职于济南市历城区文化馆，副研究馆员，从事美术创作、美术培训工作。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历城区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画院聘任画家，济南市九三学社书画院副院长，济南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团成员。2019年成功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乡土岩彩”项目以及传承人。2020年赴中央美术学院访问学者“山水画造境”方向。